臺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
2006 年 12 月，頁 159~218

BIBLID1012-8514(2006)38p.159-218
2006.10.4 收稿，2006.12.15 通過刊登

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

羅 麗 馨**

提 要

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是多元的，如蔑視朝鮮、征討朝鮮、尊敬朝鮮等，但以蔑視朝鮮的心理最值得注意。日本對朝鮮心存蔑視，此根源於《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征服三韓的傳說，及由華夷思想、領域觀念、神國思想等形成的民族優越感。日本認為朝鮮自古即向日本朝貢，是日本的屬國；視朝鮮為夷、為穢地。又如足利義滿（1358~1408）受明朝冊封後，由將軍與朝鮮行對等外交，但將軍給予朝鮮國王的國書不自稱國王，而以「日本國源某」代之，用日本年號或龍集干支。至十七、十八世紀，甚至有學者認為朝鮮文武不如日本，不必與其交鄰；批判朝鮮諂媚日本如下人，恐懼日本如囊中鼠等。至於征討朝鮮的論說，雖至十八世紀後半才出現，但隨著近現代日本遂行其大陸政策，則次第被實踐。日本是一島國，吸收大陸文化的廣度和深度，均不如朝鮮半島國家。所謂尊敬朝鮮，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尤其江戶時代，日本學者尊崇朝鮮學者，與通信使筆談、唱和詩文、求序、求字，態度恭謹；民眾則不辨朝鮮隸卒，卑屈求書畫，上下莫不以求得隻字片語為榮。

日本對朝鮮的優越感，基本上始於八世紀前後。此種意識持續至十八世紀末，因海防問題演變成主張侵略朝鮮，甚至在十九世紀末付諸行動。其間雖也有如江戶時代上下民眾熱衷朝鮮文化的盛況，但十九世紀以前，朝鮮是日本的朝貢國的觀念，及蔑視朝鮮的心理，則始終支配著日本人的意識。

關鍵詞：日本人的朝鮮觀　領域觀念　民族優越感　藩屬國　龍集干支

---

* 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 94-2411-H-005-003）成果。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二、由神功皇后傳說產生的朝鮮觀
三、由日本中心思想產生的朝鮮觀
四、「國王」與「大君」稱號所反映的朝鮮觀
五、江戶時代學者的朝鮮觀
六、江戶時代民眾的朝鮮觀
七、結論

一、前言

近代日本之所以入侵朝鮮，其思想背景雖是繼承幕末吉田松陰（1830~1859）等的「征韓論」，惟此一論說，在十八世紀後半因海防問題，以及向外擴展的野心，已有一些學者提出，並將其做為防衛日本的理論根據。但此侵略朝鮮的思想，亦有其歷史根源，即神功皇后征服三韓的傳說和豐臣秀吉（1536~1598）征討朝鮮的實例。尤其神功皇后征三韓後，半島國家向日本朝貢的觀念，深切影響十八世紀後半這些學者的思維。又，近代日本之入侵朝鮮，亦與其蔑視朝鮮有關。此種偏狹心理，則源自以日本為中心的民族優越感。中世以後，日本將半島國家視為「牲畜」。至十七、十八世紀，甚至有學者批判朝鮮是蕞爾小國，諂媚日本如下人，恐懼日本如囊中鼠。認為朝鮮非永結鄰好之國，征此國易也。探究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征討朝鮮和蔑視朝鮮這兩個觀點，對近代日本為何入侵朝鮮，多少可以理解。此外，日本是一島國，吸收大陸文化的廣度和深度，均不如朝鮮半島國家，日本自古即不斷從朝鮮吸收中國文化。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日本上下對朝鮮是相當崇敬的，尤其是重儒學的江戶時代。由此可知，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是多元的。

本論文除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外，並利用原始資料，由神功皇后的傳說和日本中心思想二個層面，探討日本人將朝鮮視為朝貢國和蔑視朝鮮

的思想根源，及此一思想支配日本人的歷程。並以「國王」和「大君」稱號問題、江戶時代學者與民眾的立場，分別論述日本人對朝鮮的意識。限於史料，學者方面僅舉較具代表性者做說明；至於民眾，則由生活面做觀察。朝鮮通信使在回國後，記錄相當多在日本的見聞，其中不免有偏見之語，但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日本學者與民眾對朝鮮的看法。日本學者和民眾的朝鮮觀，本文基本上根據這些史料做分析。

二、由神功皇后傳說產生的朝鮮觀

神功皇后的傳說，是日本自古至近世將朝鮮半島國家以「朝貢國」、「犬」視之的思想根源。為了解此一傳說內容，首先須探討最早記載神功皇后事蹟的二部史書《古事記》（712）和《日本書紀》（720）。此二書對神功皇后篇章的處理不同。《古事記》將神功皇后併入仲哀天皇，《日本書紀》第八卷是仲哀天皇，第九卷是神功皇后。根據田中卓的比較，二書每行字數不一，但大約均為三十個字左右。《古事記》〈仲哀天皇〉有五十六行，《日本書紀》〈仲哀天皇〉六十一行，〈神功皇后〉二百十行。[1]可知神功皇后的記載，《日本書紀》份量多，內容豐富。神功皇后的一生，據《日本書紀》載：皇后名氣長足姬，[2]開化天皇曾孫氣長宿禰王之女，母葛城高顙媛。[3]足仲彥天皇（仲哀天皇）二年（193）

1 田中卓，〈神功皇后をめぐる紀・記の所傳——特に神功皇后紀の成立について〉，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伊勢：皇學館大學出版部，1972），402。

2 皇后之名，《古事記》之記載為息長帶比賣。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7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37 再版），中卷，〈仲哀天皇〉，94。

3 有關神功皇后的宗譜，參見肥後和男，〈神功皇后の家系〉，《神功皇后》（東京：弘文堂，1957），22~33；黑沢幸三，〈古代息長氏の系譜と傳承〉，《文學》33 卷（1965，東京），17~31；三品彰英，〈天ノ日矛の傳說——神功皇后傳說考その一〉，收入氏編，《日本書紀研究》第 3 冊（東京：塙書房，1968），9~29；横田健一，〈神功皇后の系譜について〉，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347~399；京口元吉，〈神功皇后紀の研究——三韓征伐物語の再檢討〉，《日本歷史》1 卷 4 號（1946，

立為皇后，生譽田皇子（應神天皇）。辛巳年（201），群臣尊為皇太后，開始攝政。己丑年（269）四月，年一百歲，崩於椎櫻宮（奈良縣磯城郡），葬於狹城盾列陵（奈良市山陵町），追尊氣長足姬尊。[4]《古事記》有神功皇后母系是新羅王子天日矛後裔之記載，[5]此為《日本書紀》所無。此外，《古事記》載，皇后生品陀和氣命（應神天皇）外，另生品夜和氣命。[6]《日本書紀》則載譽屋別皇子（品夜和氣命）為弟媛所生。[7]又，《古事記》並沒有記載高麗臣服。另只記載皇后年一百歲崩，沒有提崩於那一年。[8]兩書除皇后所生皇子記載不同外，內容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繁簡不同而已。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有關神功皇后的記載，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由於她的征討新羅，高麗、百濟相繼臣服。皇后征討新羅的經過，綜合兩書之記載如下：仲哀天皇二年（193）熊襲國反叛不朝貢，天皇、皇后為征討熊襲，八年（199）正月已亥至儺縣（今博多），居於橿日宮（今香椎宮）。九月，詔群臣議討熊襲，當時神託言皇后，謂：西方有金銀國新羅，若征服新羅，熊襲自然降服。但天皇不信，仍討熊襲，結果失敗而還。九年（200）二月天皇崩於橿日宮，皇后秘不發喪。三月，皇后遣鴨別討平熊襲，並誅土蜘蛛田油津媛。九月，召集諸國車船，察看西方海上國家，占卜吉日。時皇后懷孕已臨產，但她將石頭挾於腰際，祈禱還軍之日再生產。皇后以男裝親自指揮三軍，經對馬和珥津（鰐浦）

東京），2~5、11~13；水野佑，〈神功皇后論〉，《史觀》76（1967，東京），19~21。

4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1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卷 9，〈神功皇后〉，241、248、264。皇后陵，參見藤原忠平等，《延喜式》，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40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卷 21，〈諸陵祭〉，548。皇后之諱，參見長谷川福平，〈神功皇后御諱訓考〉，《史學雜誌》15 編 9 號（1904，東京），99~108。

5 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中卷，〈應神天皇〉，106~108。

6 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中卷，〈仲哀天皇〉，94。「命」是神的敬稱，與「尊」同。

7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卷 8，〈仲哀天皇〉，233。「應神天皇」，《日本書紀》記為譽田天皇，譽田與品陀訓讀相同，譽屋別與品夜和氣訓讀亦同。

8 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中卷，〈仲哀天皇〉，96、99。

攻打新羅。得到風浪、海中大魚之助，很快到達新羅。驚愕的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距乎！」因此舉白旗投降，願為日本「飼部」（養馬），每年納貢。皇后將矛立於新羅王門前，新羅王「波沙寐錦」以「微叱己智波珍干岐」為人質，並以八十艘滿載金銀綾羅縑絹船隻，隨皇后凱歸。此後新羅王常以八十船貢於日本。高麗、百濟聽說新羅投降，自知無法抵抗亦投降，並願「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皇后將兩國定為「內官家」（提供御料），此即所謂三韓。[9]

兩書有關神功皇后的記事是否為史實，近世以前幾乎沒有任何異論。明治以後，受西洋史學研究風氣影響，史學界對皇后紀開始進行分析、批判。尤其戰後，否定神功皇后的學者更多，[10]即主張神功皇后是為正當化「新羅臣服」而創造出來的人物，其事蹟均是偽造。這些學者提出各種疑點，如軍隊登陸地點、行軍路線、戰鬥情形等，完全沒有紀錄；投降的新羅王，《日本書紀》記載是：「波沙寐錦」。此王應是新羅第五代王「婆娑尼師今」，[11]但「婆娑尼師今」是傳說時代的王，並非歷史上真實的人物；人質「微叱己智波珍干岐」一事，與《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實聖王元年（402）條之記載相似，[12]但與神功皇后的時代不符。神功皇后於仲哀天皇九年親征新羅，但此時朝鮮半島上只有馬韓、辰韓、弁韓，百濟、新羅尚未成立；日本、天皇、三韓等用語，當時皆不存在。[13]至於傳說產生的背景、年代、史料運用等問題，或認為五至六世紀日本與新羅關係緊張，《日本書紀》特別提出新羅臣服、永遠朝

9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卷 8，〈仲哀天皇〉，233~237；卷 9，〈神功皇后〉，241~248；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中卷，〈仲哀天皇〉，94~96。「飼部」於《古事記》之記載為「御馬甘」。

10 吉井良隆，〈神功皇后研究史〉，《藝林》10 卷 4 號（1959，京都），20。

11 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京城府：朝鮮史學會，1928），卷 1，〈新羅本紀 1〉，8。

12 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卷 3，〈新羅本紀 3〉，頁 3 載：「（實聖尼師今）元年三月，與倭國通好，以奈勿王子未斯欣為質。」

13 岡部精一，〈神功皇后の三韓退治〉，《歷史地理》朝鮮號（東京），186~187。

貢的觀念，正顯示此時日本對新羅強烈的征服欲；[14]或認為仲哀天皇的死、新羅王的投降、應神天皇的誕生、神功皇后女帝的地位等傳說主體，是由齊明天皇的驟死、推古朝征討新羅、草壁皇子的誕生、推古以後女帝頻繁出現等事實，逐漸形成的。推古（593~628）、齊明（655~661）、天智（662~ 671）三朝與新羅關係的困境，更促成此一傳說的成立。但傳說大綱的確立，大約是七世紀以後，神功皇后則是以推古、齊明、持統三女帝為對象塑造出來的人物。[15]或認為神功皇后的傳說，其材料有些是取自《百濟記》、《魏志》、《晉起居注》等朝鮮和中國的史料。[16]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此神功皇后的傳說充滿神異，宗教色彩顯著。[17]在現代，雖仍有學者對此傳說持肯定的態度，[18]但其虛構性，大致已為日本學界所公認。

---

14 岡本堅次，《神功皇后》（東京：吉川弘文館，1959），75。

15 直木孝次郎，《日本古代の氏族と天皇》（東京：塙書房，1964），153~170。皇極天皇（642~644）原是舒明天皇的皇后，舒明天皇死後即天皇位，大化革新時退位；孝德天皇死後，重新踐祚，為齊明天皇。參見全國歷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20。

16 津田左右吉，〈百濟に關する日本書紀の記載〉，收入氏著，《津田左右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63），第 2 卷，第 4 篇，附錄 1，252~256；平田俊春，〈神功皇后紀の成立と日本書紀の紀年〉，《日本古典の成立の研究》（東京：日本書院，1959），162~165；李根雨，《百濟記の主役》，收入上田正昭編，《古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1），332~333；岡本堅次，《神功皇后》，155~ 165；本居宣長，〈馭戎慨言〉，收入大久保正編，《本居宣長全集》第 8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 初版三刷），35~36。《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至〈雄略天皇〉引用《百濟記》。參見三品彰英，〈百濟記、百濟新撰、百濟本記について〉，《朝鮮學報》24（1962，奈良天理市），1。

17 植村清二，〈神功皇后は果して架空の人物か〉，《日本歷史》20（1949，東京），27。

18 肯定神功皇后傳說的學者，大正時代如和辻哲郎。參見和辻哲郎，《日本古代文化》（東京：岩波書店，1925 改訂版），76~81。昭和時代，如太田亮、橋本增吉、坂本太郎、三品彰英、植村清二、肥後和男等。參見所功，〈現代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観——研究文献の要約〉，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120~123、126~127、134~136、138~140、149~152、167~169。小林行雄從考古學提出旁證，認為〈神功紀〉和〈應神紀〉中豐富的日朝關係記事，沒有必要完全將其看做是後代所潤飾而加以否認。參見

由於皇后征服三韓，半島上的國家成為日本的朝貢國。此一觀念，至近世不變。以外交文書和禮儀而言，如大化元年（645），給百濟之詔有「始我遠皇祖之世，以百濟國為內官家」之語。[19]天平勝寶四年（752）六月，在朝堂宴饗新羅使節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廷者，始自氣長足媛（神功）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於今，為我蕃屏。」[20]翌年（753）正月，在唐朝含元殿朝賀禮上，日本與新羅爭席位時，古麻呂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21]寶龜十一年（779），天皇賜予新羅使節金蘭蓀的璽書，有「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尚矣」之語。[22]由於日本將新羅視為朝貢國，但新羅常不守朝貢禮儀，以致雙方外交糾紛不斷。此時，日本朝廷的對應，只是遣使至奉祀皇后的香椎廟祈願或防備而已。[23]如《續日本紀》天平九年（737）四月乙巳條載：

> 遣使於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二社及香椎宮奉幣，以告新羅無禮之狀。[24]

同書，天平寶字六年（762）十一月庚寅條載：

> 遣參議從三位武部卿藤原，朝臣巨勢麻呂、散位外從五位下土師宿彌犬養奉幣於香椎廟，以為征新羅調習軍旅也。[25]

《日本三代實錄》元慶二年（878）十二月十一日條載：

小林行雄，〈神功、應神紀の時代〉，《朝鮮學報》36（1965，奈良天理市），25~46。

19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卷 25，「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七月丙子」條，218。

20 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2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卷 18，〈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752）六月壬辰」條，214~215。

21 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卷 19，〈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正月丙寅」條，219~220。

22 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卷 36，「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二月庚戌」條，457。

23 香椎廟，即今日福岡縣糟屋郡香椎村的官幣大社香椎宮。奈良至平安時代被當做廟，約於圓融天皇（969~983）時代成為神社，祭神是息長帶比賣命（神功皇后）。參見高階成章，〈神功皇后紀の成立過程〉，《國學院雜誌》48 卷 9 期（1942，東京），17~18。香椎宮即香稚宮，日本史料兩者都使用。

24 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卷 12，〈聖武天皇〉，143。

25 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卷 24，〈淳仁天皇〉，289。

> 大宰少貳從五位下嶋田朝臣忠臣等奏言，橿日宮有詫宣云：新羅虜船欲向我國，宜為之備。[26]

幕府時代，半島國家為日本朝貢國的觀念，仍不斷出現於各類記載。如成書於鎌倉時代（1192~1333）後期的《八幡愚童記》（又名《八幡愚童訓》），[27]有神功皇后征服高麗後，約定今後「備奉年貢事」之記事。[28]《太平記》（約 1371）中有「高麗人來朝事」一語。[29]天正 17 年（1589），西海道某州及肥前州源久成等，送朝鮮使節的禮單中有「朝鮮國使臣來朝」之語。[30]豐臣秀吉征朝鮮時，一些從軍武士在其日記中，亦有皇后征三韓的敘述，且認為三韓入貢是先例。如鍋島直茂（1538~1618）家臣田尻鑑種的《高麗日記》、松浦鎮信（1549~1614）家臣吉野甚五左衛門的《吉野日記》、加藤清正（1562~1611）家臣下川兵大夫的《清正高麗陣覺書》等。[31]至於秀吉本身，於奉祀神功皇后的伏見（今京都市伏見區）御香宮舉行出征儀式，在前往肥前名護屋（今佐賀縣）途中，參詣長門國府神功皇后的社祠（下関忌宮神社）等，[32]亦是與從軍武士同樣

---

26 藤原時平等奉敕撰，《日本三代實錄》，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6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卷 34，〈陽成天皇〉，440。

27 成立年代，大約在後二條天皇即位至後深草法皇崩之間，即正安三年（1301）至嘉元二年（1304）之間。參萩原龍夫校注，《八幡愚童記》乙，收入櫻井德太郎、萩原龍夫、宮田登編，《日本思想大系》20（東京：岩波書店，1975），《寺社緣起》，〈解說文〉，207。久保田收認為是花園天皇時代，即延慶元年（1308）至文保二年（1317）。參見久保田收，〈中世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70。

28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收入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神道大系》（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1992），上上，〈降伏事〉，123。

29 後藤丹治、岡見正雄校注，《太平記》3，收入高木市之助等監修，《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62），卷 39，450。

30 金誠一，《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1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卷 4，〈倭人禮單志〉，45 上。

31 北島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58~59。

32 貝原好古，《八幡宮本紀》，收入益軒會編纂，《益軒全集》5（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1991），卷 3，712 上~713 上；北島万次，《豊臣政權の対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

的思維。1748 年出版的《朝鮮來朝記》，卷首則有神功皇后征三韓，「是後，世世入貢我朝」等記載。[33]即將朝鮮通信使視為與「三韓獻貢物」一樣，是朝貢使節。又如浮世繪畫家羽川藤永的「朝鮮人來朝圖」（約 1748 年，收藏於神戶市立博物館）、奧村政信（1686~ 1764）的「朝鮮人來朝圖」（收藏於上野博物館）、喜多川歌麿（1753~ 1806）的「朝鮮人來朝行列圖」（1811 年，長門市岡藤家藏）等，由畫題可知大約亦是此一思想的反映。[34]

至於將半島國家的人視為「鬼」、「犬」的蔑視心理，與《八幡愚童記》〈降伏事〉中的皇后記事，有密切關聯。此書和《日本書紀》有三大不同點：（一）仲哀天皇時，有「形如鬼神，身色赤，頭八，乘黑雲，飛虛空」，叫塵輪者，由異國來攻擊日本。天皇和皇后率領五萬軍兵至長門國豐浦郡，雖射殺塵輪，但天皇中流矢而死，並遺言皇后要征討異國。[35]即神功皇后的出兵是為復讐，並不是為取得金銀財寶。[36]由異國入侵的塵輪，狀如鬼神。（二）皇后使用旱珠和滿珠打敗異國；與皇后相戰的是高麗而非新羅。（三）異國投降後，皇后以弓弭（弓的末端）在大磐石上書寫「新羅國大王，日本國之犬也」。異國則約定，今後「成日本之犬」。[37]此書將來自半島的外敵視為「鬼」、「犬」，大約與高麗協助蒙古入侵日本，因此怨恨高麗有關。之後，如《太平記》載，神功皇后以弓弭在石壁上書「高麗王我日本之犬也」。[38]此即是來自《八幡

京：校倉書房，1998），143；金光哲，《中近世における朝鮮観の創出》（東京：校倉書房，1999），195。

33 松田甲，〈李朝英祖時代戊辰信使の一行〉，《日鮮史話》第 4 編（東京：原書房，1976），64。《朝鮮來朝記》一書，編者不明，為松田甲個人收藏。

34 與朝鮮通信使有關的各種繪畫，可參考李進熙，《江戶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講談社，1999），241~243；辛基秀，《朝鮮通信使往來》（東京：明石書店，2002），各插圖。

35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上上，〈降伏事〉，113~114。

36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37。

37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上上，〈降伏事〉，114~123。

38 後藤丹治、岡見正雄校注，《太平記》3，卷 39，〈神功皇后攻新羅給事〉，457。

愚童記》的意識形態。豐臣秀吉征朝鮮時，吉川廣家（1561~1625）的從軍禪僧宿蘆俊岳，在其《宿蘆稿》中載：

> 昔時，神功皇后欲治異國，異國忽乞降，皇后聽焉。自忠州而歸本朝，直以弓劃石曰：唐土王者日本犬也。至今膾炙世俗之人口矣。[39]

即宿蘆俊岳亦有皇后以弓劃石，曰：「唐土（朝鮮）王者日本犬也」之思維。

十七世紀中葉，以朱子大義名份為基礎編纂的《大日本史》，[40]對新羅的記載，主要根據《日本書紀》，其注中有：

> 按八幡愚童訓、太平記曰：皇后以弓弭畫石上曰：新羅王日本犬。按皇后征新羅，非問罪之師，止降服朝貢耳，不應辱國王如此已甚，二書所載，未知何據，蓋以上世有火酢芹命苗裔諸隼人等，代吠狗而奉事之說，附會為此說耳。[41]

即否定《八幡愚童訓》和《太平記》二書視新羅為「犬」的傳說。認為皇后出兵的目的，在使新羅投降朝貢而已，不至於如此侮辱外國國王，此應是附會。又，貝原好古（1664~1700）在其《八幡宮本紀》書中，對《八幡愚童記》的記載，亦一一加以否定，認為於石上刻「新羅國王日本犬」的傳說，是附會等。[42]與《大日本史》一樣，將神功皇后的傳說，回復到《日本書紀》的記載。當時這些儒學者，雖從道德角度重新解釋此一傳說，但對民眾並沒有太大影響。如京都在祇園祭時，船鉾上裝飾有角有牙的鬼，此鬼即是三韓。[43]1791 年上演的淨瑠璃《神功皇后三韓責》，其中有皇后在岩石上刻「三韓王日本之犬」一幕。[44]可知此種蔑

---

39 宿蘆俊岳，《宿蘆稿》，收入塙保己一原編，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13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9），卷 356，1003 下。

40 1657 年，德川光圀於藩邸設史局，開始著手編纂，其後進行兩百五十年，至 1906 年完成。

41 源光圀修，源綱條校，源治保重校，《大日本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9），卷 232，〈諸蕃 1〉，「新羅上」，248。

42 貝原好古，《八幡宮本紀》，卷 1，639 上；卷 2，660 下、661 上下夾注；卷 2，665 下。

43 塚本明，〈神功皇后傳說と近世日本の朝鮮觀〉，《史林》79 卷 6 號（1994，京都），20。

44 紀海音，〈神功皇后三韓責〉，收入海音研究會編，《紀海音全集》（大阪：清文堂，

視心理，亦深入到庶民生活之中。

《古事記》與《日本書紀》記載神功皇后征服三韓後，三韓成為日本朝貢國的觀念，沿襲至近世不變。而元軍征日後，由於對高麗的怨恨，傳說增加更多新內容，尤其將異國人形容成狀如鬼神，將新羅（高麗）王視為「犬」的蔑視觀，透過節慶、戲劇等形式，在近世社會大眾之間亦廣泛流傳。[45]

三、由日本中心思想產生的朝鮮觀

所謂日本中心思想，是一種日本民族至上、日本民族優越的意識。其形成與華夷思想、領域觀念、神國思想有關，由這些思想觀念亦可觀察日本將半島國家當做「藩屬國」和「夷」的差別意識。

（一）華夷思想

日本華夷思想的天下觀，約出現於五世紀末。[46]從七世紀後半至八世紀前半，日本學習中國王朝的華夷思想，將天皇置於頂點，建立起「東夷小帝國」的規模。[47]在此一以華夷思想為基礎構造的「小帝國」中，

1978），第 5 卷，62；另參見氏著，〈新羅國ノ大王ハ日本ノ犬ナリ〉，《中近世における朝鮮観の創出》（東京：校倉書房，1999），303~370。

45 關於神功皇后傳說對近現代的影響，參見羅麗馨，〈日本人的朝鮮觀——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待刊稿）。

46 江田船山古墳（九州熊本縣菊水町）出土的鐵刀和稻荷山古墳（埼玉縣行田市）出土的鐵劍，都有「大王」銘文，日本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此大王應是指雄略天皇。雄略天皇一般認為即是倭王武，武曾上表南朝宋，謂倭國東征毛人，西服眾夷，渡平海北。以倭國領域為「天下」的小世界天下思想形成。參見西嶋定生，《日本歷史の国際環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76~77；井上光貞，〈鉄剣の銘文——五世紀の日本を読む〉，收入氏著，《井上光貞著作集》第 5 卷，《古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86），407~409；〔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97，〈夷蠻傳〉，2395。

47 石上英一，〈古代東アジア地域と日本〉，收入網野善彥等編，《列島内外の交通と国

新羅被日本視為是屏藩、附庸國。如日本對統一新羅的國書，開頭是用「天皇敬問新羅王」，[48]根據《延喜式・慰勞詔書式》載：「大蕃國云天皇敬問，小蕃國云天皇問」，[49]即將新羅以大蕃國視之。大寶元年（701）編定的大寶律令中，諸蕃、外蕃、蕃客、蕃使、蕃人、蕃賊等稱呼，均是指新羅（或渤海）。[50]又，《日本書紀》稱朝鮮為「蕃」、「蕃國」、「諸蕃」、「西蕃」，朝鮮女性為「蕃女」，朝鮮神為「蕃神」。[51]「蕃」和「蕃國」，《日本書紀》的古訓讀是「トナリ」（tonari，隣）和「トナリクニ」（tonarikuni，隣国），並沒有侮蔑的意思。但《日本書紀》不用「隣」、「隣国」，而用「蕃」字，顯示對朝鮮具有優越感。[52]

此一以中國的華夷思想構造的「小帝國」，在十世紀新羅、渤海滅亡後，[53]大致已不存在，但對朝鮮的差別意識並未消失。如 918 年高麗代新羅而興，永曆三年（1079）十一月，高麗王文宗（1047~1083 在位）中風，致書日本求良醫，大宰府在拒絕的回覆文中，有「抑牒狀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可稱，宅遐陬而跨上邦，誠彝倫攸

家》（東京：岩波書店，1987），62~70；石上英一，〈古代国家と対外關係〉，收入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講座日本歷史》卷 2，《古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271、273~274；石母田正，〈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国際意識について〉、〈天皇と諸蕃〉，皆收入氏著，《日本古代国家論》第 1 部（東京：岩波書店，1973），326~327、331~332。

48 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前篇，卷 3，「文武天皇慶雲 3 年正月丁亥」條，24。

49 藤原忠平等，《延喜式》，卷 12，〈中務省式〉、〈慰勞詔書式〉，「天皇敬問云云」，夾註，350。

50 鈴木靖民，〈奈良時代における対外意識——「續日本紀」朝鮮関係記事の檢討〉，收入氏著，《古代對外関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190~191。

51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第 1 卷上，卷 9，「神功皇后攝政四十九年春三月」條，261；卷 15，「清寧天皇三年十一月」條，399；同書，第 1 卷下，卷 17，「繼體天皇六年冬十二月」條，18；「繼體天皇二十三年春三月」條，27；「繼體天皇二十四年秋九月」條，31；卷 19，「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條，78。

52 旗田巍，〈日本人の古代朝鮮史への関心〉，收入滕維藻等編，《東アジア世界史探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90~92。

53 新羅於 935 年滅亡，渤海於 926 年滅亡。

斃。」[54]即將高麗王仍視為「蕃王」，高麗是「遐陬」的邊境國家，日本是「上邦」。十三世紀中葉，元軍二次征日，高麗做為元軍的前進基地，協助蒙古侵襲日本。日本對高麗的憎恨，加上八世紀以來將朝鮮諸國置於附庸國的歷史情緒，以致出現將高麗與蒙古同視為「夷」的新夷狄觀。如 1271 年日蓮給平賴綱的書信中，有「夷狄伺國」之語。[55]三別抄的珍島政府向日本求援時，日本朝廷亦有「有西蕃（高麗）使介，告北狄（蒙古）陰謀」之語。[56]《太平記》在敘述神功皇后的傳說事蹟時，對朝鮮半島國家，仍用「三韓之夷」、「高麗之夷」等語。[57]此日本型華夷思想，至江戶時代仍存在，如林羅山（1583~1657）言：「朝鮮者，自古為我西蕃。今及其來而厚惠之，是亦柔遠人懷諸侯之意乎。」[58]1617 年，朝鮮使節至日本慶賀日本統一，以心崇傳（1569~1633）與老中土井大炊頭利勝等人，商討回覆朝鮮國王的國書是否用「國王」稱號問題時，以心崇傳認為「高麗小夷」，不需用「王」字。[59]中井竹山（1730~1804）在其《草茅危言》中亦稱朝鮮「蕞爾偏邦」，[60]反對與朝鮮採對等之禮。

（二）領域觀念

日本的領域觀亦含有民族優越感。中世較早具體指出日本國家領域的記載，如《延喜式》（927）中有：

---

54 三善為康輯，《朝野群載》，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29 卷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卷 20，〈異國〉，457。

55 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東京：東京堂，1971~1989），第 14 卷，300，10872 條，〈文永八年九月十二日日蓮書狀〉。

56 藤原經長，《吉續紀》，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料大成》23 冊（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5），「文永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條，297 下。

57 後藤丹治、岡見正雄校注，《太平記》3，卷 39，〈神功皇后攻新羅給事〉，457。

58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大阪：弘文社，1930），卷 22，〈朝鮮信使來貢記〉，250 上。

59 新井白石，〈國書復號紀事〉，收入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東京：吉川半七，1906），第 4 冊，697。

60 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出版者不明，寬正元年〔1789〕序），卷 2，〈朝鮮之事〉，54 上。

> 穢惡疫鬼藏隱所所村村，千里之外，四方之堺，東方陸奧，西方遠值嘉，南方土佐，北方佐渡。[61]

即東至陸奧，西至遠值嘉（五島列島），南至土佐，北至佐渡。鎌倉時代，《曽我物語》（十四世紀前半）有二處四方國境之記載，其一：

> 平家時伊豆駿河討敵者，逃越武藏、相模、安房、上總，雖今日明日，歷經多日，當時東津輕、外濱，西壹岐、対馬，南土佐，北佐渡，此等之間，無論逃越何國何島，終被尋出。……。[62]

其二：

> 五郎聞之，……遁可延至何處，南限熊野，北限佐渡島，東至津輕、蝦夷島，西至鬼界、硫黃島，……。[63]

根據史料一之記載，東之範圍為津輕、外濱；西為壹岐、對馬。因「硫黃島」在中世似是鬼界島的一部分，鬼界島和硫黃島是重複。[64]所以根據史料二的記載，鎌倉幕府支配的範圍，東至蝦夷島，西至鬼界島。高麗屬日本西境，除《保元物語》（1219~1222）有記載外，[65]並沒有確切史料可以證明當時是在鎌倉幕府支配之下。[66]

村井章介認為，國家的周邊和異域之間稱為境界。中世國家的境界，東是外濱、蝦夷島，西是鬼界島（硫黃島）。但境內、境界、異域之間，很難截然且固定的加以區分。如果從《延喜式》、《新猿樂記》、《保元物語》、《慈光寺本承久記》、《日蓮遺文》、《入來文書》、《八幡愚童訓》、《妙本寺本曽我物語》、《融通念佛緣起》、《義經記》、《ひめゆり》

---

61 藤原忠平等，《延喜式》，卷 16，〈陰陽寮〉，443。

62 生田目經德，《曽我物語》（東京：誠之堂書店，1908），卷 5，122~123。

63 生田目經德，《曽我物語》，卷 9，225。

64 中世的鬼界島，《平家物語》用「硫黃嶋」。參見高木市之助等校注，《平家物語》，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2（東京：岩波書店，1959），卷 2，〈大納言死去〉，186~187。

65 永積安明、島田勇雄校注，《保元物語》，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1（東京：岩波書店，1961），中，〈左府御最後〉，132。

66 各史料出現的日本境界，參見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收入氏著，《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114，表 3。

等記載，勉強綜合出典型的境界，則可以說東是外濱，西是鬼界島（硫黃島）或壹岐、對馬。其外側是異域，東為蝦夷島，西為琉球或高麗。[67]

中世日本人對空間有所謂的淨穢觀念，即將國家領域的中心視為淨，領域的周邊視為穢。由淨穢觀念產生的「淨的都市構造」，不僅是以天皇為淨的頂點，「非人」為穢，與身分相對應的垂直構造；而且是由皇都⟶畿內⟶外國，向外擴展，距離皇都越遠，穢亦隨之增加，由淨⟶穢的同心圓構造。[68]因此境界和境外的異域，是充滿「穢」的空間；境外異域的住民，則被看做是恐怖的鬼。[69]如前述，高麗是異域，是穢地，所以和境內的「非人」一樣，[70]受到歧視。如《八幡愚童記》在敘述新羅、百濟、高麗國的王臣貪欲、驕恣之後，有「其子孫，今世之屠兒也」之語，[71]即將三韓人等同日本社會內部的賤民。又如前述高

67 參見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115。律令國家的國境支配觀，持續至十世紀初。此後，國境應由國家支配的認識漸消失，變化的原因，與小帝國的構造已有名無實，及地方行政制度變質有關。參見ブルース・バートン，〈古代日本の国境と大宰府〉，收入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異国と九州——歴史における国際交流と地域形成》（東京：雄山閣，1992），60~63。

68 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112；另參見應地利明，〈日本図と世界図——絵地図に描かれた中世日本の異域〉，收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自意識と相互理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307~310。

69 參見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109~111；大石直正，〈外が浜・夷島考〉，收入関晃教授還暦記念會編，《関晃先生還暦記念日本古代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0），574~582。古代日本的對外關係，並沒有將「境界外」視為鬼。將其視為鬼是平安中期，鬼怪奇談出現於九至十世紀。參見伊藤喜良，《日本中世の王権と権威》（京都：思文閣，1993），132。境界住民的共同特徵是，全身長毛、語言難懂、不知農業、殺生等。參見不著撰人，《諏訪大明神繪詞》，收入塙保己一原編，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32），第 3 輯下，卷 73，494~539；高木市之助等校注，《平家物語》，卷 2，〈大納言死去〉，186~187。

70 「非人」本來是佛典之語，指夜叉等空想的怪物，後來演變為乞食、乞丐、屠夫、放免、謀叛人等的用語，做為穢者的意識觀念很強。參見伊藤喜良，《日本中世の王権と権威》，138。

71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上上，〈降伏事〉，112、113。

麗王文宗中風，向日本求良醫被拒絕一事，《續古事談》中有源經信在評議會中，放言「高麗王患惡瘡而死，對日本有何不妥」，而決定不派遣醫生之敘述。源經信將高麗王患風疾說是罹惡瘡，此在其日記《帥記》和同時代的史料中均未看到。很明顯的，這是文學創作，但也反映視高麗為穢地、高麗人是賤民的觀念。[72]此異域為穢地的對外觀，隨蒙古入侵危機的消失、記憶的淡薄，及海上交通往來的活絡，至十五世紀，對國家周邊和往來境界的人（如對馬島和倭寇）而言，則有異域是另一個文明之地的認識。[73]但境內的人對朝鮮的蔑視心理，似未曾改變。如1479 年朝鮮國王成宗（1470~1494 在位）和李仁畦有如下的問答：

> 其國無郵驛，其俗耕田以馬，凡輸物人擔之，而放牛山谷間，牛皆肥腯。臣等問曰：可得宰牛而食乎？答云：汝國好食走獸，誠可醜惡。且倭人待我甚薄，臣偶入僧舍，求飲水，乃以故器與之，飲畢即破棄。又饋食用木器，食畢必蹴踏毀之，乃曰：汝不染齒，不班衣，好食獸肉，良可醜也。見必掩鼻而過。[74]

李仁畦於 1443 年隨正使卞孝文至日本，以上是他在日本的見聞。即他在某個僧舍想要飲水，僧舍的人用有瑕疵的器具盛水給他，並在他喝完之後立刻丟棄此器。又，進食時用木器，吃完後亦將木器踏毀。理由是「汝不染齒，不班衣，好食獸肉。」另外，看到他們必掩鼻而過。日本人有染齒、穿「青質白文」衣、不吃肉的習慣，對不染齒、穿白衣、吃肉的朝鮮人，因習俗不同，顯現出露骨的蔑視態度。[75]

---

72 不著撰人，《續古事談》2（1219）（高麗ノ王惡瘡ヤミテシナム、日本ノタメニナニクルシ），轉引自村井章介，〈中世における東アジア諸地域との交通〉，收入朝尾直弘等編，《日本の社會史》第 1 卷，《列島內の交通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94），111。

73 村井章介，〈中世における東アジア諸地域との交通〉，111~113。村井章介認為，此與「京都－西國」和「鎌倉－東國」為中心的兩個同心圓地域構造的形成有關。參見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126，圖 5 及 117~133。

74 《成宗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特別市：東國文化社，1955），卷 101，「十年二月丙申」條，693 下。

75 日本人不吃肉，與佛教戒律禁止殺生有關。此雖是在僧舍，但也是一般日本人對朝鮮人

（三）神國思想

《日本書紀》記載，神功皇后率軍隊到達新羅時，驚愕的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76]這是日本是「神國」一語最早出現的記載。如前述，神功皇后的傳說並非事實，但卻反映此一思想的時代意識。九世紀中期以後，表現日本是「神國」的用語，如「我日本朝所謂神明之國」、[77]「我國是神國也」、[78]「本朝神國」、[79]「抑本朝神國」、[80]「抑我朝神國」、[81]「日本者神國也」等，[82]有增多的傾向。鎌倉時代，文獻記載更多，如《吾妻鏡》、《撰集抄》、《續後撰和歌集》、《保元物語》、《源平盛衰記》、《倭姬世記》、《玉葉》、《玉藻》、《平戶記》等，均可散見「神國」一語。[83]當蒙古招諭國書陸續送達，對外關係緊張的時刻，日本是神國的思想更是瀰漫國內。此時期的神國思想，國家主義思想濃厚。[84]加上在蒙古詔諭期間開始孕育的「神孫君

的態度。日本人感覺外國人臭，至江戶時代不變。參見田中健夫，〈十五世紀日朝知識人の相互認識〉，收入氏著，《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89。

76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卷 9，〈神功皇后〉，247。

77 藤原時平等奉敕撰，《日本三代實錄》，卷 16，「貞觀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條，255。

78 中村直勝，《宇多天皇御事紀》（京都：宇多天皇一千年御忌臨時局，1930），第 1 章第 4 節，〈寬平の治（下）〉，61。

79 藤原實資，《小右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別卷 1~3（京都：臨川書店，1965），278 下。

80 《堀河天皇》，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 3 編之 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 覆刻），「寬治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條，998。

81 《堀河天皇》，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 3 編之 1，「寬治四年十二月十六日」，998。

82 藤原賴長，《台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 23 卷（京都：臨川書店，1997），78 上。

83 鎌倉幕府編，《吾妻鏡》，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50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卷 3，104，「元曆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甲申」條；卷 4，157，「元曆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條。另參見清原貞雄，《中世国民の精神生活》（東京：中文館書店，1939），195~197。

84 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197~199。

臨」、萬世一系的神裔思想，[85]及日蓮、貞慶、光宗、慈遍等認為日本並非佛教三國世界觀（天竺、震旦、日本）中，位居最下位的邊土小國，而是超越諸國，是大國，是位居世界中央，[86]此種神聖的國土觀，遂產生對外優越意識。此一偏狹的神國思想，以致日本對蒙古、朝鮮半島的國家，均以畜牲視之。如《八幡愚童記》有「蒙古是犬之子孫，日本則神之末葉也。貴賤相別，天地懸隔也。神明畜類何及對揚」與「新羅國大王，日本國之犬也」等語。[87]幕府在受蒙古二次侵襲之後，分別於建治元年（1275）十二月和弘安四年（1281）八月，企圖「異國征伐」。[88]「異國」指高麗，此征伐又稱「高麗征伐」、「高麗發向」。[89]因史料不足，實際情況不得而知。但以高麗做為征討對象，亦應是當時的神國思想，及本國優越意識的一種反映。[90]

又如三國的世界觀，由地理而言，日本與天竺、震旦並立，[91]但朝鮮半島則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八幡愚童記》載：「雖三韓歸此土（中華），吾朝未屬他國。」[92]《善隣國寶記》（1466）亦載：「又吾國佛

85 不著撰人，《本朝文集》，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30 卷（東京：國史大系刊行會，1938），卷 67，〈贈蒙古國中書省牒〉。

86 參見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第 15 卷，377 上，11837 條，〈文永十二年二月日蓮書狀〉；同書，第 3 卷，193 下，1485 條，〈元久元年十月十七日沙門貞慶咒願文〉。釋光宗，《溪嵐拾葉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續諸宗部 7 第 76 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1973），第 6 卷，518 下；慈遍，《旧事本紀玄義》，收入續群書類從完成會編，《續群書類從》，第 1 冊，神祇部（東京：平文社，1970），卷 5，155 上。

87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下上，〈降伏事〉，152；同書，上上，〈降伏事〉，122。

88 相田二郎，《蒙古襲來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128~129、142~145。

89 川添昭二，《北条時宗》（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155；相田二郎，《蒙古襲來の研究》，129~130。

90 南基鶴，《蒙古襲來と鎌倉幕府》（京都：臨川書店，1996），214。

91 成書於十一世紀末的《今昔物語集》，是一部描述世界神話的書籍。此書分天竺、震旦、本朝（日本）三部分，此正可說明日本人所意識的全世界，就是此三國。

92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上上，〈降伏事〉，112。

法，始自百濟而傳焉，今屬之震旦何也，百濟蓋震旦之域也。泛而言之耳，此記多載新羅、高麗事，亦攝之震旦之故也。」[93]即政治上，日本不屬於任何國家，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則是中國的藩屬國。朝鮮半島的國家由於非獨立國，因此劣於日本，應從屬日本。此種日本是神國，日本與天竺、震旦並立，甚至位居其上的優越感，亦是中世以後，日本對朝鮮半島國家始終潛藏著敵視態度的思想因素。

四、「國王」與「大君」稱號所反映的朝鮮觀

日本歷史上的「日本國王」稱號問題，始自明朝建立後兩國間的往來。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洪武年間日本使節至明朝有十次，其中六次為「日本國王良懷」所派遣，[94]二次為「日本國臣足利義滿」所派遣，另二次只記載「日本國」、「日本」，派遣者與使節不清楚。[95]此時明朝以為日本的君主是懷良親王，對足利義滿（1358~1408）二次入貢，均予以拒絕。第一次是洪武七年（1374）六月，《太祖實錄》載：

> ……宣聞溪等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上命却其貢，……遣還。勅中書省曰：……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96]

93 瑞溪周鳳，《善隣國寶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1 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序〉，2。田中健夫認為，日本視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為同一文化圈，兩者間並沒有嚴密區別，如同歐美人對中國、朝鮮、日本沒有嚴密知識一樣，這與日本是島國有關。參見田中健夫著，〈中世日本人の高麗、朝鮮観〉，《対外関係と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1991 再版），340。

94 良懷應是征西將軍懷良（1329~1383），後醍醐天皇之子，南朝的征西將軍，後受九州探題今川了俊壓迫漸衰。

95 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58~61。鄭樑生認為，以日本國王良懷為名義的使節有六次，以日本或日本國為名義的有三次，由足利義滿派遣的使節有二次，島津氏久派遣的使節有一次，總計十二次。參見鄭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1985），133~134。

96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縮印本，1984 再版），卷

第二次是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太祖實錄》又載：

> 日本國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上命却其貢。[97]

入貢的條件必須是國王、有表文。但義滿的身分是「征夷將軍」、天皇的臣下，而且無表文，因此明朝不許其入貢。建文三年（應永八年，1401），已掌握政治實權的義滿，再度以「日本准三后道義」的名義，[98]上表「大明皇帝陛下」，[99]此時建文帝正與燕王戰爭中，因此歡迎日本的朝貢。翌年（1402）二月建文帝的回詔中，稱義滿為「日本國王源道義」，並有「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100]等語。永樂元年（應永十年，1403）二月，義滿又遣天龍寺僧堅中圭密出使明朝。在給明朝的表文中，自稱「日本國王臣源」。[101]永樂帝則派遣冊封使趙居任隨日本使節赴日。由於 1402 年 6 月南京已為燕王攻下，義滿受惠帝冊封後的情況，缺乏較明確的史料。但受成祖之冊封，在《善隣國寶記》中則有不少相關記載，如應永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的〈大明書〉中，都載有「日本

90，「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條，1581。

97 《明太祖實錄》，卷 133，「洪武十三年九月甲午」條，2112。

98 義滿於應永二年（1395）六月出家，號道義。准三后，即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之意。義滿知以人臣身分，無法上表明皇帝，因而用此曖昧稱號；此時義滿並非征夷大將軍亦非太政大臣。參見田中健夫，《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7；田中健夫，《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11。義滿的官歷，見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87；鄭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141。

99 中原康富，《康富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37 冊（京都：臨川書店，1965），「應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條，「日本准三后道義書上大明皇帝陛下」，3 上。

100 瑞溪周鳳，《善隣國寶記》，卷中，34。

101 義滿的國王稱號，二条滿基、瑞溪周鳳、滿濟准后都有批判，或言此對天皇不敬、僭上，或言此為辱國。戰前的史學家對這些批判多表贊同，但戰後的史學家如伊東多三郎、田中健夫則認為，他們的批判只是擔心和明的對等關係、文書的形式，並非幕府的外交路線。參見佐佐木銀彌，《日本中世の流通と対外關係》（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49~54；伊東多三郎，〈將軍、日本國王と稱す〉，《日本歷史》60（1953，東京）；田中健夫，《中世海外交涉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9），168。

國王源道義」；十三年的詔書中，有「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錫」之語；十五年義滿死，特賜謚「恭獻」等。[102]

義滿被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後，1404 年開始與朝鮮的外交，不再用「日本國大將軍」或「日本國大相國」等稱號，而正式改用「日本國王」，此亦為朝鮮方面所接受。如朝鮮《太宗實錄》四年（1404）七月己巳條載：「日本遣使來聘且獻土物，日本國王源道義也。」[103]此後除義持（1386~1428）拒絕明朝冊封期間外（1411~1432），日本國王遣使朝鮮總計在六十次以上，朝鮮國王派遣至日本的使節也有六十一次之多。[104]朝鮮於 1403 年受明朝冊封，[105]對同樣與明朝建立宗藩關係的足利政權，外交上堅持交鄰政策，即不論幕府或將軍地位有何變化，「朝鮮國王」與「日本國王」的對等關係不變。[106]朝鮮方面認為「日本國王」擁有外交權，是直接交鄰的對象。朝鮮常以「日本國王」稱呼足利將軍，給予將軍的國書，有時用「日本國殿下」，但通常用「日本國王殿下」，年號則使用明朝的年號。但日本方面給予朝鮮國王的國書，原則上自稱「日本國源某」，年號用「龍集干支」。[107]足利政權對朝鮮，一方面保持同

102 瑞溪周鳳，《善隣國寶記》，卷中，36~39。

103 《太宗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特別市：東國文化社，1955），卷 8，「四年七月己巳」條，301 下。

104 參見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東京：至文堂，1966），88~89、93~102，「十五、六世紀日本国王使、朝鮮通信使年表」；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108；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東京：明石書店，2000），74~75，表 3「14~16 世紀の日本國王使一覽」；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東京：文獻出版，1986），63~120。

105 太宗三年（1403）四月受明冊封，參見朝鮮《太宗實錄》，卷 5，「三年四月甲寅」條，261 下~262 上。

106 関德基認為，從朝鮮國王對「敵禮的交隣對象」（日本國王）與「羈縻圈交隣對象」（日本地方有勢力者、女真人）的接待沒什麼差別，可以推測朝鮮國王與足利政權間的外交，並非敵禮。參見関德基，〈朝鮮朝前期の「日本国王」——「敵礼」の面から〉，收入氏著，《前近代東アジアのなかの韓日関係》（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94），55~64。

107 參見荒野泰典，〈大君外交体制の確立〉，收入氏著，《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164。龍集：龍是木星，集是星的聚集處，即木星的星座，

是明朝冊封國的交鄰關係；另一方面則仍存在著自律令體制完成後視朝鮮較日本低下的意識。[108]

天正十八年（萬曆十八年，1590）朝鮮通信使至日本時，朝鮮方面的國書仍稱秀吉「日本國王殿下」，並用明朝「萬曆」年號。秀吉則用「朝鮮國王閣下」此一視朝鮮較日本低下的文書格式，並自稱「日本國關白」，用日本「天正」年號。[109]秀吉並未受明朝冊封，但外交上朝鮮仍將關白看做是日本國王。慶長八年（1603），德川家康（1542~1616）任征夷大將軍後，開始透過對馬宗氏進行與朝鮮恢復國交。[110]朝鮮於慶長十二年（1607）派遣使節慶賀秀忠（1579~1632）繼任將軍，[111]元和三

一年一次聚集之日。日本在年號的使用上，是干支之前用龍集等星座名稱，如「龍集甲午年」。參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77，表 6，「朝鮮国王宛書翰記載年號一覽」。將軍不一定是國王，朝鮮將室町政權的首領視為國王政權的首領，這是歷代日本國王能積極與朝鮮進行外交往來的原因。參見田中健夫，〈足利將軍と日本国王号〉，收入氏著，《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11~35。日本給予朝鮮國王國書的樣式，參見高橋公明，〈室町幕府の外交姿勢〉，《歷史學研究》546 號（1985，東京），27，附表。

108 八世紀初，日本大體完成律令體制，並建立「東夷小帝國」，此一小帝國將新羅視為朝貢國。參見羅麗馨，〈日本型華夷觀——七～九世紀日本的外交和禮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 期（2006，臺北），62~66、68~76、89~91、95~98。

109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1 冊，35~36；三鬼清一郎，〈関白外交体制の特質をめぐって〉，收入田中健夫編，《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78~79。

110 1606 年，日本應朝鮮要求，先遞送國書。家康並未得到明朝冊封，但此次國書，日本除自稱國王外，還使用「日本國王」印。1607 年，朝鮮使節副使慶暹曾問景轍玄蘇和宗義智，為何關白無王號，而印文卻刻日本國王。玄蘇的回答是此印為前關白秀吉拒絕明冊封（1596），明使留下的。參見慶暹，《海槎錄》上，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2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庫刊行會，1986 再版），三月十五日條，39；中村榮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266；中村榮孝，〈豊臣秀吉の日本国王冊封に関する誥命、勅諭と金印について〉，《日本歷史》300（1973，東京），120。足利將軍給朝鮮、琉球的書信，使用「德有鄰」的印章。參見田代和生、米谷均，〈宗家旧藏「図書」と「木印」〉，《朝鮮學報》156 輯（1995，奈良天理市），77~81。

111 1605 年，家康把將軍職位讓給兒子秀忠，他自己做為「大御所」，掌握實權。

年（1617）遣使祝賀日本統一（1615 年滅豐臣氏），這兩次朝鮮的國書，仍稱秀忠「日本國王殿下」，秀忠亦自稱「日本國源秀忠」。[112]寬永元年（1624），為慶賀家光（1604~1651）繼任將軍職，朝鮮依例派遣使節至日本，國書還是用「日本國王殿下」；日本方面則使用「日本國主」。[113]日本給予朝鮮的國書，自足利政權以來，都不用「國王」二字。此正如以心崇傳所言：「自古我王未曾有與蕃夷相問之書也。高麗小夷，故我所貽書不寫王字，例也。」[114]即元軍征日後視高麗為夷，蔑視朝鮮意識的繼承。

如前所述，1607 年、1617 年、1624 年三次日本方面的國書均未以「國王」自稱，但卻被對馬宗氏家老柳川調興竄改為「日本國王」。此一竄改國書事件於寬永十二年（1635）被揭發後，幕府的解決方法是將德川將軍的對外稱號改為「日本國大君」，自己仍稱「日本國源某」，用日本年號。[115]「大君」稱號的設定，可以說是脫離以明皇帝為中心，只有受冊封國王間有外交往來的國際秩序。此後，僅在正德元年（1711）因新井白石（1657~1725）的建議，朝鮮國書一度使用「日本國王」稱號外，[116]皆使用「大君」稱號的外交模式持續至幕末。[117]

---

112 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46、48、50、51。

113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卷 94，朝鮮國部 70，101。

114 新井白石，〈國書復號紀事〉，收入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4 冊，697。

115 柳川調興竄改國書的經過，參見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239~242；田代和生，《書き替えられた国書》（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123~182。幕府不用國王稱號而用大君稱號的經緯，參見《寬永十三丙子年朝鮮信使記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一六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條。

116 參見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399~408。新井白石對朝鮮外交的改革，於 1719 年又恢復舊制（1628 年的禮制）。成島司直編，《德川實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45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33），第 8 篇，「享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條，頁 78 下載：「此日林大學頭信篤，在御前面議接待朝鮮信使之禮。應盛慮，立即與宿老會議。廢正德之例，復興天和舊例。」

117 中村榮孝，〈前近代アジア外交史上の德川政権——「日本国大君」外交の成立とその終末〉，《朝鮮學報》45 輯（1967，奈良天理市）；今村鞆，〈新井白石と朝鮮信使〉，《朝鮮》147 號（1972，京城府），52~53。有關 1590 年和江戶時代十二次朝鮮國王與

1635 年，幕府決定將軍的對外稱號用「大君」，其理由據《寬永十三丙子年朝鮮信使記錄》載：

> 公儀御名之事于翰則可稱奉之大君矣，于言又如何稱奉耶。掃部頭（井伊直孝）曰：如此事吾輩亦難計，道春、永喜所思如何？其不可稱上之王也，將軍者又於漢唐為中下之官矣，所要只欲不奉稱王者而御位亦不降也。[118]

即道春（林羅山）認為，將軍在中國是中下之官，不適合做為對外稱號。大君則是既不稱王，其位亦不低於王的稱號。[119]1711 年，新井白石對「大君」稱號提出反對，主張日、朝雙方的國書都應使用「日本國王」。他反對「大君」稱號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大君二字是天子之意，所謂日本國大君即日本國天子；（二）朝鮮稱正妃所生之子為大君。[120]至於主張用「國王」稱號的理由，則是朝鮮稱天皇為日本天皇，稱將軍為日本國王。「皇」和「王」大小字義不同，皇是天，因此稱天皇；王是國，故稱國王。上下名分有別，天地不可易位。將軍自稱國王，對天皇並無不妥。[121]

將軍往來國書中，彼此的稱呼，參見藤田明，〈江戶時代に於ける朝鮮使節の來朝に就きて〉，《歷史地理》朝鮮號（1904，東京），269~270。

118 《寬永十三丙子年朝鮮信使記錄》，「一六三五年八月十六日」條。

119 中村榮孝認為，大君稱號是新造的語詞，且可能是出自林羅山。參見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下，482~483；另參考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卷 13，〈外國書中〉，「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條，141。

120 新井白石，〈朝鮮國信書の式の事〉，收入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4 冊，671 上、下。

121 新井白石，〈殊號事略〉下，收入今泉定介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3 冊，〈復號の御事〉，636 下~637 上。有關新井白石恢復「國王」稱號問題，可參考栗田元次，〈新井白石の政治思想と王號復行問題〉上、中、下之 1、下之 2，《歷史と地理》5 卷 1 號、4 號、5 號、6 號（1920，東京）；栗田元次，〈新井白石の政治思想〉，《歷史と地理》15 卷 5 號（1925，東京）；德島一郎，〈新井白石の外交政策〉上、下，《歷史と地理》22 卷 3 號、4 號（1928，東京）；德島一郎，〈新井白石と德川幕府の對外文書に於ける將軍の稱號に就いて〉（一）、（二）、（三），《歷史と地理》23 卷 1 號、3 號、4 號（1929，東京）；三浦周行，〈新井白石と復號問題〉，《史林》9 卷 3 號（1924，京

新井白石此一建議得到將軍家宣（1662~1712）支持外，室鳩巢（1658~1734）、太宰春台（1680~1747）也表贊同。室鳩巢認為，天皇用天子號，王號是下一等。朝鮮顧忌清皇帝，因此稱朝鮮國王，日本武家顧忌京都天皇，故稱日本國王。[122]太宰春台則言：「今大將軍有海內，是則日本國王也」、「稱奉大君，僭稱也。大君天子也。」並稱讚白石此舉「英斷當義事也」。[123]但另一方面反對者亦相當多，如菱川大觀在《正名緒言》中說：「顧者大君則婉，而王號則直也。事或關係天朝，對言不可苟焉，則吾從其婉者矣。」[124]中井竹山言：「大君之字，宇宙間此外無可用之文字」、「大君之文字，萬世不易之適稱事，明白且不容置喙。」[125]兩人均支持「大君」稱號。雨森芳洲（1667~1755）則從武家昌隆皇室式微、大君稱號之意涵、歷代將軍不敢自王等觀點，批評白石採用「日本國王」稱號之不當。他說：

> 竊惟國家源平相軋以來，王綱日弛，不絕如線，徒擁虛器；為域內之共主。而世掌兵權者，名雖大臣，實乃國王，爵祿廢置，皆出其手。[126]
>
> 大君之稱，固似不穩，稱王之舉，亦為失宜。後世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自諉焉。……夫大君之稱，在易則固為至尊之名，然古今異稱，時有轉移。或以嫡王子為大君，或以侯伯為大君，或稱人父為尊大君，見於傳記，歷歷可考。非若皇帝或天子及王號，古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夫然則我國大君之稱，大

都）等論文。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德川幕府》（東京：明石書店，1997），196~202。

122 室鳩巢，《兼山秘策》，收入瀧本誠一編，《日本經濟叢書》卷 2 第 2 冊（東京：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1914），274~276。

123 瀧本誠一編，《日本經濟大典》（東京：史誌出版社，1928），第 9 卷，經濟錄卷 1，〈經濟錄凡例〉，388。

124 菱川大觀，《正名緒言》（嘉永二年〔1849〕版，和泉屋善兵衛發行），卷上，27。

125 西村時彥編，《竹山國字牘》（大阪：松村文海堂，1911），卷下，〈答藤江貞藏書〉，24、26 下。

126 雨森芳洲，《橘牕文集》，收入雨森芳洲，《芳洲文集》（吹田市：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80），卷 2，〈論國王事與某人書〉，40 右、左。

> 君即冢君，猶言諸侯之長也。云爾，有何不可哉。[127]
>
> 且或稱日本國殿下，或稱日本國王殿下，或稱日本國大君殿下，咸出於彼之所稱。而在我則自將家以來，至天和壬戌，歷世相承，但稱日本國源某，其所以難於稱呼者，豈非不敢偪上之意，隱然見于書法之間乎。今乃欲一舉而廢之，苟知王霸之辨者，其誰不為之拊心。余之所以極力辨駁奮不顧身者，實由此也。[128]

雨森芳洲認為，大君稱號雖不妥當，但其意涵時有不同，在日本為諸侯之長之意，用之有何不可。朝鮮對日本有日本國殿下、日本國王殿下、日本國大君殿下等稱呼，但將軍歷代相承，只自稱日本國源某，就是不敢僭上。若廢大君改用國王稱號，正可稱王霸之辨者的心，這是他極力反對的理由。

贊成「國王」稱號者認為，大君是天子稱號，用「大君」稱號對天皇而言是僭越。反對論者剛好相反，認為「國王」稱號是僭上。無論用「國王」或「大君」，兩者都將天皇置於將軍之上，但掌握實權的將軍則是朝鮮交鄰的對象。從兩國交換的國書來看，將軍給予朝鮮國王的國書只用日本年號，這是將軍認為日本不同於朝鮮，日本是一獨立國，並非中國的藩屬。1607 年、1617 年、1624 年朝鮮三次要求將軍用日本國王稱號，[129]幕府則堅持沒有必要，國書仍自稱「日本國源某」，其緣由即是視朝鮮為蕃夷。1711 年，幕府要求朝鮮國書中對將軍的稱謂由「大君」改為國王，此重大外交禮儀問題，在事前雙方的「節目講定」中並沒有提出。[130]又，此一變更稱號的通知是在朝鮮慶賀使節團一行到達釜

127 雨森芳洲，《橘牕文集》，卷 2，〈論國王事與某人書〉，41 左~42 右、43 右。

128 雨森芳洲，《橘牕文集》，卷 2，〈論國王事與某人書〉，43 右左。

129 関德基認為，朝鮮前期（1392~1592），無論足利將軍是否使用「日本國王」稱號，或家光以後用「大君」稱號，或家宣時改用「國王」稱號，朝鮮方面都未將此視為問題。朝鮮只在此時對日本是否自稱「國王」問題表示高度關心，是因豐臣秀吉給予朝鮮的國書，有使用上下關係的文字，即脅迫朝鮮臣服的內容，由此一經驗所產生的。參見関德基，〈家康期の朝、日講和交涉と対馬——講和条件「二件」を中心に〉，收入氏著，《前近代東アジアのなかの韓日関係》，172~173。

130 《增正交鄰志》，收入《奎章閣叢書》第 6 冊（京城府：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40），

山時，才由對馬使者口頭傳達。[131]此種無視國際禮儀的行動，或者亦可說是未將朝鮮真正視為對等國意識的另一種反映。

日本不少學者認為，日本國書不自稱「國王」和「大君」，是根源於自古以來對朝鮮的蔑視心理。如田中健夫認為，足利將軍給予朝鮮國王的國書不用「日本國王」，而自稱「日本國源某」，且用日本年號，這是因為日本不願承認彼此間同是受明冊封，即所謂國王間的關係。而日本所以有此舉，則是來自將朝鮮置於下位的意識。[132]吉野誠認為，使用「國王」稱號，則日本是明朝的藩屬，意味著和朝鮮是對等國，此為屈辱之事。然而避免使用「國王」稱號，也可以說是幕府自身對朝鮮持有蔑視感的反映。又，幕府蔑視朝鮮的意識，與天皇的存在不可分。將軍與朝鮮國王是對等，天皇則位在將軍之上。天皇的存在，成為蔑視朝鮮的根據。[133]荒野泰典認為，將軍不自稱「日本國大君」，只有朝鮮對日的國書才使用。將軍自己依舊用「日本國源某」，這是沿襲室町幕府以來的對朝鮮政策，是蔑視朝鮮觀的表現。[134]以上日本學者都是從自古以來蔑視朝鮮的觀點做評論。韓國學者閔德基則有不同的解讀，他認為足利將軍對朝鮮不自稱國王，是因為天皇即國王，這是日本國內的事情，他反對田中健夫所謂足利將軍不自稱「國王」是蔑視朝鮮的理論。此外，他又認為，朝鮮對日「敵禮的交鄰」雖然積極，但由於室町幕府對外交欠缺認識，以致視日本為「鄰國」的對日政策受到挫折。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朝鮮反而將日本視為野蠻的「倭賊」、「倭奴」國。[135]

卷 5，〈信行各年例〉，34 下~35 下。

131 信使團於五月十五日從漢陽出發，五月二十九日在釜山才從對馬得到通知。朝廷中有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最後肅宗採納天和二年（1682）通信使節團正使尹趾完的意見更改國書。七月五日，通信使持已更改的國書由釜山出發。參見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401~408。

132 田中健夫，〈鎖国成立期における朝鮮との関係〉，收入氏著，《中世対外関係史》，107~108。

133 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東京：明石書店，2002），19~20。

134 荒野泰典，〈大君外交体制の確立〉，213。

135 閔德基，〈朝鮮朝前期の「交隣」にみる対外關係〉，收入氏著，《前近代東アジアの

無論是室町時代或德川時代，日朝雙方在外交上，相互的認識和對應的態度，都有相當大差距。以室町時代而言，朝鮮與足利將軍之間採對等的交隣，雙方互派使節。但由朝鮮國王世宗（1419~1450 在位）時，日本於 1420 年、1425 年、1448 年三次遣使至朝鮮，世宗均將使節安排在西班三品的位置；對日本在外交上的無理，時予以指責；對日本使用「小國」、「書契亦恭順」等語，知其對日本不無藐視之心。[136]另外，朝鮮也和對馬宗氏、大內氏、日本國內特定勢力等這些非對等對象，採取大國對待小國模式的外交。[137]這是朝鮮對日外交的特質。反觀足利幕府在國內並無統制力，遣使朝鮮的目的僅在求取大藏經、梵鐘等佛典、佛具，或營造寺社的募緣，或斡旋與明交通，或為貿易之利等。所謂對朝鮮蔑視的意識，現實上並無太大意義。[138]至於德川時代，將軍無論用「大君」或「國王」稱號，在日本國內，朝鮮通信使都被看做是朝鮮國王對德川將軍的「御禮」或入貢。[139]如通信使在江戶城上呈國書時，對將軍是行四拜禮，[140]此四拜禮為蕃國王對明皇帝的禮儀。[141]又如將軍接見朝鮮使節時，最初皆有酒禮和饌宴（宴饗）。但第五次（1643）通信

なかの韓日関係》，44。1719 年，雨森芳洲曾於江戶客館，辭色甚為不平地問製述官，為何朝鮮人所撰文集中，常稱日本為倭賊、蠻酋。參見申維翰，《海游錄》下，收入《海行摠載》第 1 輯，〈附聞見雜錄〉，14 上、下。

136 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91。

137 関徳基，〈朝鮮朝前期の「交隣」にみる対外關係〉，23~33；高橋公明，〈外交儀礼よりみた室町時代の日朝関係〉，《史學雜誌》91 卷 8 期（1982，東京），70 上~80 下；長正統，〈中世日鮮関係における酋使の成立〉，《朝鮮學報》41 輯（1966，奈良天理市），52~86。

138 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89。

139 荒野泰典，〈大君外交体制の確立〉，217；孫承喆，〈朝鮮中華主義と日本型華夷意識の対立〉，收入孫承喆著，山里澄江、梅村雅英譯，《近世の朝鮮と日本——交隣関係の虚と実》（東京：明石書店，1998），278~279。

140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卷 76，〈朝鮮國部〉52，〈信使聘禮、營中御饗〉，457 下~462 下；趙曮，《海槎日記》，「二月二十七日」條，32 上載：「三使行四拜禮，四拜禮未知始於何時，而誠可寒心也。」

141 申時行，《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卷 58，〈蕃國禮〉，1~3。

使至日本時，只行酒禮；第十一次（1764），將軍則舉空杯。另外，第七次（1682）時，將軍雖與使節對坐，但卻用簾子遮隔；第十一次，將軍更故意高坐，兩次皆讓使節看不到將軍的容顏，以致正使尹趾完和趙曮均為此發怒。[142]除這些接待禮儀不對等之外，1607 至 1811 年，朝鮮十二次遣使至日本，[143]但幕府僅經由對馬宗氏與朝鮮進行交涉，將軍則未曾直接遣使至朝鮮。此雖與朝鮮在受豐臣秀吉侵略後，對日本加強警戒，不願日本人踏足朝鮮，及幕府採取鎖國政策，[144]對外態度趨於消極等有關。但不可否認的，在幕府領導階層間，蔑視朝鮮的心理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朝鮮對德川幕府改「大君」或「國王」稱號，並未予以拒絕的理由，則與其國內政情有關。1636 年，朝鮮有所謂「丙子胡亂」，與日本交鄰，目的在牽制北方清軍的威脅。[145]1711 年決定更改國書的理由，由禮曹參判金鎮圭、兵曹參判尹趾仁、工曹參判權尚游等人的意見得知，亦是基於現實考量。即遵循舊例，以穩定雙方的關係，藉此確保南方安全。[146]此外，由為數頗多通信使所撰寫的日本紀行，則可以看到朝鮮使節對日本有高度的文化優越感，[147]這些或許才是朝鮮對德川將軍遣使的本質。

日本型華夷秩序形成於七至八世紀，九世紀以後已無法維持。十七世紀再度出現，德川幕府將朝鮮、琉球、荷蘭等外國使節，均視為朝貢

142 三宅英利，〈德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朝鮮學報》82 輯（1977，奈良天理市），121。

143 三宅英利，〈朝鮮王朝通信使一覽〉，《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644~645。

144 幕府於 1633、1634、1635、1636、1639 年五次發布鎖國令，完成鎖國。參見全國歷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鎖國〉，123~124。

145 「丙子胡亂」即 1636 年清軍入侵朝鮮。參見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281~292。

146 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係史の研究》，404~407。

147 參見《海行摠載》收錄之各種通信使日本紀行。朝鮮人所撰文集，常稱日本為倭賊、蠻酋，稱日本人為倭人、群倭。參見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14 上、下；同書，上，「六月三十日」條，54 上。

使節。[148]朝鮮王朝在十七世紀亦因明朝滅亡，而以中華文明繼承者自居，此即所謂「朝鮮中華主義」。[149]日、朝兩國在十七世紀均以不同方式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雙方都存在著自我中心意識。將軍稱號的變更，即是基於此一「日本型華夷意識」。而朝鮮願意接受，則是基於「朝鮮中華主義」的帝王之道。因此雙方在外交文書上，雖有不對等現象，但表面上還能維持「交隣體制」。

五、江戶時代學者的朝鮮觀

江戶時期學者的朝鮮觀是多元的，大致可分：（一）尊敬朝鮮、（二）蔑視朝鮮、（三）征討朝鮮三類。[150]但同時存有尊敬朝鮮和蔑視朝鮮兩種觀念者，亦有之。下面僅就此三類略做論述。

（一）尊敬朝鮮

所謂尊敬朝鮮，主要是尊敬朝鮮的學者和文化。日本的儒學者相當尊敬朝鮮學者，尤其是李退溪（1501~1570），[151]如確立江戶時代儒學基礎的藤原惺窩（1516~1619）和林羅山，兩人的學問都深受李退溪的影響。李退溪門下弟子姜沆（1567~1618），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被俘虜至日本，惺窩和姜沆相識，並受其教。[152]惺窩的學問基礎可以說是李退溪的朱子學。慶長五年（1600）關原之役後，[153]惺窩被德川家康召為御前

148 孫承喆，〈朝鮮中華主義と日本型華夷意識の対立〉，276~279。

149 孫承喆，〈朝鮮中華主義と日本型華夷意識の対立〉，269~274。

150 姜德相，〈日本の朝鮮支配と民衆意識〉，《歷史學研究》，516 號（1983，東京），43。

151 李退溪，名滉，朝鮮朱子學的代表學者。

152 辛基秀，〈姜沆と藤原惺窩〉，收入辛基秀、村上恆夫編，《儒者姜沆と日本》（東京：明石書店，1992），269~275；松田甲，〈藤原惺窩と姜睡隱の関係〉，收入氏著，《續日鮮史話》第 1 編（東京：原書房，1976 復刻 1931 年原本），19~38。

153 支持豐臣政權五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糾集反德川家康的勢力，與德川家康激戰於美濃（岐阜縣）的關原，結果石田敗北，德川家康確立霸權。參見依田熹家，《日本通史》

講讀。此時惺窩開始模仿朝鮮，穿「深衣道服」，使用朝鮮版漢文書籍。他篤好唐制和朝鮮之禮，衣服飲食必欲仿唐和朝鮮。[154]林羅山比惺窩更傾慕朝鮮學問，他在儒學、歷史、文學、醫學、兵學等各方面的學問，均得自朝鮮書籍。與惺窩一樣，在朝鮮學者中，他特別尊敬李退溪。他曾說：「退溪辯，尤可嘉也。」[155]並有「勞如圃隱要須慰，理與退溪將共窮」、「退溪李氏拔群殊，貴國儒名世僉呼」二詩讚美退溪。[156]又如土佐（今高知縣）朱子學者山崎闇齋（1618~1682），[157]他最尊敬退溪，尤其受退溪的《自省錄》影響很深。他的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淺見絅齋（1652~1711），及其門派村上玉水（1733~1776）、古賀精里（1750~1817）、稻葉迂齋（1684~1760）、稻葉默齋（1732~1799）、楠木端山、楠木碩水等，都是尊信李退溪的學者。[158]其他如熊本朱子學者大塚退野（1677~1750）、藪孤山（1735~1802），亦傳習退溪之學。其門下橫井小楠（1809~1869）、元田永孚（1818~1891），皆受退溪影響。[159]日本儒學者對在日本的朝鮮學者，亦相當尊敬。如鄭月峯（1575~1640）、洪浩然（1581~1657）、李真榮（1571~1643）三人是豐臣秀吉侵略朝鮮

（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136。

154 矢沢康佑，〈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朝鮮観について〉，《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6 特集，「明治百年」と朝鮮（1969，東京），16 下；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東京：勁草書房，1969），13；阿部吉雄，〈藤原惺窩と朝鮮儒學〉，收入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81。

155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卷 14，〈外國書下〉，158 上。

156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詩集》（東京：弘文社，1930），卷 48，〈外國贈答中〉，514 下；卷 49，〈外國贈答〉下，527 上。

157 土佐朱子學派，又稱海南學派或南學派，以南村梅軒（生卒年不詳）為始祖。谷時中（1598~1649）將儒學由佛學分離，下傳野中兼山（1615~1663）、山崎闇齋。參見全國歷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137；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69~70。

158 芳賀登，《日韓文化交流史の研究》，81；矢沢康佑，〈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朝鮮観について〉，16 下~17 上。

159 王中田，《江戶時代日本儒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4；旗田巍，《日本人の朝鮮観》，13；矢沢康佑，〈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朝鮮観につい

時的俘虜。但鄭月峯在德島備受禮遇；[160]洪浩然有文才，成為儒者仕君側；[161]李真榮在和歌山講學，後擔任紀州藩主的侍講。其子李梅溪（1617~1682）亦以紀州儒員聞名。[162]

日本儒學者崇敬朝鮮的態度，在與通信使的文化交流上，亦有明顯反映。此類事例非常多，在此僅舉數例說明。通信使抵達江戶後，在歡宴席上，幕府通常會派學者與使節對談。使節參見將軍時或歸途上，各地學者亦常到客館與其聯誼，相互筆談朝鮮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醫藥、朝鮮著作，或唱和漢詩，或求書畫等。在江戶的交流，如 1607 年、1624 年、1636 年、1643 年、1655 年五次朝鮮使節至日本時，林羅山均參與筆談、唱和。[163]此種交流以天和二年（1682）和 1711 年這二次較正式，但 1711 年則最盛。《通航一覽》載：「按使者來聘，必筆談唱和，天和、正德之頃，其事盛，故書類成冊至百數十卷。」[164]1682 年 8 月，朝鮮使節到江戶時，門下有眾多著名學者的木下順庵（1621~1698），二次至客館本誓寺與通信使對談。[165]此時新井白石則因對馬學者西山健甫

て〉，17 上。

160 内藤雋輔，〈壬辰、丁酉役における被擄朝鮮人の刷還問題について〉，《朝鮮學報》29 輯（1963，奈良天理市），92。

161 松田甲，〈朝鮮より出でたる佐賀の儒者洪浩然〉，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 2 編（京城府：朝鮮總督府，1926），20~34。

162 松田甲，〈紀州德川家の大儒李梅溪〉，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 3 編（京城府：朝鮮總督府，1927），3~15；辛基秀，〈李真榮、梅溪と朝鮮通信使〉，收入氏著，《朝鮮通信使——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東京：明石書店，1999），75、81~91。

163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第 3，卷 108，〈朝鮮國部〉84，〈筆談唱和等〉，263 上~273 上；卷 109，〈朝鮮國部〉85，〈筆談唱和等〉，273 下~281 下。林羅山的孫子林信篤，與其二子信充、信智於 1719 年與申維翰也有多次的筆談、唱和。參見同上書，卷 110，〈朝鮮國部〉86，〈筆談唱和等〉，287 下~290 下；申維翰，《海游錄》中，70 下~72 下；阿部吉雄，〈林羅山と朝鮮儒學〉，收入氏著，《日本朱子學と朝鮮》，212~228。

164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第 3，卷 108，〈朝鮮國部〉84，〈筆談唱和等〉，263 上。

165 新井白石、室鳩巢、雨森芳洲、祇園南海、榊原篁洲等五人，稱為「木門五先生」；加上南部南山、松浦霞沼、三宅觀瀾、服部寬齋、向井滄洲，稱為「木門十哲」。其他還有西山順泰、岡島石梁、岡田竹圃、堀南湖、石原鼎庵、圓田雲鵬、青木東庵、板倉復

的介紹，到本誓寺與製述官成琬、裨將洪世泰等，唱和筆談，並請成琬為其詩集《陶情集》作序。後來他寫有「送成伯圭琬之日本」詩，追慕成琬崇高的人格。[166]此次與通信使筆談、唱和的儒者，還有福岡的貝原益軒（1630~1714）、岡山藩牛窓的富田元真、小原善助。在大阪客館本願寺，有祖辰長老、松下貝林（1637~1703）等。在京都本國寺客館，有柳川震澤（1650~1690）、滝川昌樂、青木東庵、木下菊潭、熊谷了菴等。在江戶本誓寺，則另有人見友元、林整宇、春庵、漸軒、雞峯等。[167]1711年，通信使至江戶時，新井白石已是幕府儒官、將軍的側進，他二次與正使等筆談。第一次是 10 月 28 日，他與幕府儒員室鳩巢、三宅觀瀾（1675~1712）、木下菊潭、服部寬齋、土肥霞洲（1693~1757）、深見玄岱（1649~1722），及紀洲藩儒者祇園南海（1677~1751）等，齊至客館，與正使趙泰億（1675~1728）、副使任守幹、從事官李邦彥、製述官李礥、書記嚴漢重、南聖重、良醫奇斗文、醫員玄萬奎、通事趙君瑞、鄭昌周等筆談、唱和。[168]第二次是 11 月 5 日，他與正使趙泰億筆談的話題很廣，大致可分海外知識、中華文明的問題、日韓外交的根本方針、國諱問題、禮儀文物遺存的問題等五項。[169]筆談結束，泰億曰：「疆域有限，海陸遙隔。一別之後，嗣音無路。言念及此，能不挹挹。唯有一片明月，分照萬里之心肝耳。」白石對曰：「鄙懷亦唯在隰桑之卒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諸公歸國之後，幸賜東望相思。」[170]此應非僅是

軒等，都是著名儒者。參見松田甲，〈朝鮮に名を博せる木下順庵〉，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 5 編（京城府：朝鮮總督府，1933），66~67。

166 新井白石，〈折たく柴の記〉，收入今泉定介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3 冊，卷上，27上；松田甲，〈新井白石の詩と朝鮮信使〉，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 2 編，107~111。

167 李元植，〈天和度（1682）朝鮮信使裨將洪世泰と日本文士との筆談唱酬について〉，《朝鮮學報》98 輯（1981，奈良天理市），17~51；植野武雄，〈木下順庵父子と朝鮮使節〉，《朝鮮》174 號（1929，京城府），68~76。

168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と深見玄岱〉，《日本歷史》384 號（1980，東京），51~52。

169 趙泰億，〈江關筆談〉，收入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4 冊，725~731；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と趙泰億〉，《歷史》5 輯（1952，仙台），30~38。

170 趙泰億，〈江關筆談〉，731。

外交辭令，大約也是兩人相遇情誼心聲的表達。白石堅決主張改革接待通信使的禮儀，其中雖有對抗朝鮮之意識，但就個人情誼而言，他仍擔心泰億的立場。他還透過對馬向朝鮮禮曹極力辯明改國書之事，非使節之過。[171]至於室鳩巢等七人與使節筆談、唱和的詩文，則留下《朝鮮客館詩文稿》一卷、《支機閒談》一卷、《班荊集》二卷、《桑韓唱酬集》一卷、《賓館縞紵集》二卷、《桑韓唱和集》一卷、《正德和韓集》二卷等所謂《七家唱和集》。[172]大學頭林信篤（1644~1732）與製述官李礥則筆談朝鮮歷史、國王服飾、旗幟、科舉，以及朝鮮是否有大明律諸書等。[173]1719 年，通信使在江戶期間，林信篤先後五次領其二子信充、信智至客館，呈詩篇向三使求應和，或與製述官申維翰、三書記姜栢、成夢良、張應斗等，筆談、酬答、敘話、乞字、敘別等。[174]申維翰批評他的文章「拙樸、不成樣」。[175]三使對其求應和，答曰：「國書未傳，使事未了之前，閑漫吟詠，道理未安。竣事歸時，當有奉和云云。」父子三人則「唯唯而去。」[176]

諸藩儒者與通信使唱和，較著名者如雨森芳洲，他是對馬藩的真文役。[177]1711 年，他隨通信使一行從釜山至日本，旅途中與製述官李礥交

171 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と趙泰億〉，38~41。

172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と深見玄岱〉，55。

173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第 3，卷 110，〈朝鮮國部〉86，〈筆談唱和等〉，287 上~291 上。

174 申維翰，《海游錄》中，70 下~71 上，72 上、下。

175 申維翰，《海游錄》中，71 上。《海游錄》下，12 下載：「林信篤為日本第一耆碩，……而詩文則無一可觀。」1764 年，信篤孫大學頭林信言與其子秘書監信愛與趙曮筆談。大學頭是世襲，趙曮認為自其高祖林道春（號羅山）任大學頭後，其後世掌此職者，皆不如道春。參見趙曮，《海槎日記》，收入《海行摠載》第 7 輯，「二月二十二日」條，30 下。信言和信愛父子亦與製述官南成應和詩。參見趙曮，《海槎日記》，「三月九日」條，35 上。

176 申維翰，《海游錄》中，71 上。1764 年通信使與日本文人的唱和，可參考李元植，〈明和度（1764）の朝鮮国信使——成大中との筆談唱酬詩卷を中心に〉，《朝鮮學報》84 輯（1977，奈良天理市），87~96。

177 真文役，類似書記之官，擔任接待使節、撰寫與朝鮮之外交文書等工作。

往最密切。此時與通信使唱和的詩文，很多保存在他的《縞紵風雅集》中。[178]1719 年 8 月 18 日，信使團至赤間関（下関），長州藩儒者佐佐木縮往、山縣良齋、草場居敬等擔任接待工作。當夜，芳洲、佐佐木等人和製述官申維翰、書記姜栢、成夢良、張應斗等唱酬的詩文，則收錄於藩校明倫館所編的《兩関唱和集》中。[179]通信使在歸途行至大阪時，雨森芳洲還為京師貴人向申維翰求序、求字。申維翰《海游錄》載：

> 雨森東持二十四帖孝子圖，自帝舜至宋賢，各畫其行事，逐幅有詩。錦衣粧縹，貯之漆凡，觀其題目，乃辛卯（1711）從事官李邦彥筆也。問主者，則曰：皇京貴人，而不道名。諸倭之奉几者，珍重不敢慢。但乞序於余，余披圖見訖，作序遺之。東又以唐紙絕美者，連糊而來，請余手書，筆畫與字行，皆用準尺，必致精謹，為之看護而去，曰：不如是，則吾屬恐有罪。未知何等貴人，使他敬畏如此。[180]

雨森芳洲持京師貴人的二十四帖孝子圖，向申維翰求序。之後，又以最好的唐紙向申維翰求字。芳洲通曉朝鮮語言，研究朝鮮歷史、風俗，著有〈朝鮮風俗考〉（1720）、〈交鄰提醒〉（1728）等。[181]他認為日本與朝鮮，應「互不欺不爭，以真實交」，與朝鮮結「誠信之交」。[182]

會津松平氏是德川氏的分支，1711 年通信使至日本時，第三代正容公派藩儒松本肅齋等赴京都迎接。當時加賀的學者稻生若水、青地淩新亦到京都，三人相伴赴客館本國寺與朝鮮文士會談。肅齋與朝鮮文士的唱和詩，收載於《雞林唱和集》。當時正容公還請朝鮮學者為其祖正之公的遺著撰寫序文。文化八年（1811），通信使僅至對馬島行賀禮，第

178 上垣憲一，《雨森芳洲》（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138~139。

179 松田甲，〈毛利氏の朝鮮聘使接待〉，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 4 編（京城府：朝鮮總督府，1928），114~117；李進熙，〈雨森芳洲の朝鮮観〉，收入氏著，《日本文化と朝鮮》（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0），179~180。

180 申維翰，《海游錄》中，75 下。

181 李進熙，〈雨森芳洲の朝鮮観〉，170、174。雨森芳洲，〈朝鮮風俗考〉，收入氏著，《芳洲外交關係資料、書翰集》（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1982），40~44。

七代容眾公派高津溜川至對馬，請求朝鮮文士為藩校日新館圖題序。而溜川與朝鮮文士賦詩屬文，後來全收錄在《對禮餘藻》。[183]

每當朝鮮通信使至日本，江戶的儒者必與使節筆談兩國的國體、朝典，或雜談、吟詩。使節團沿途所經各地，當地的儒者亦紛至客館唱和漢詩、求書畫等。日本儒者尊敬朝鮮學者，熱衷朝鮮文化。

（二）蔑視朝鮮

江戶時代，一些學者追求古道，批判儒、佛，主張日本至上。他們將日本和其他國家，尤其是朝鮮、琉球做比較，認為日本是最優秀的國家，因此對朝鮮的蔑視顯現得更露骨。江戶時代的蔑視朝鮮觀，可以說始自德川家康。慶長三年（1598）九月，毛利輝元（1553~1625）、宇喜多秀家（1573~1655）、前田利家（1539~1599）、德川家康四人聯名，令黑田長政（1548~1604）等從朝鮮撤軍並及早議和時，提出的議和條件是朝鮮王子到日本，否則獻貢物也可以，[184]即要求朝鮮入質朝貢。此雖是四人聯名，但至少家康沒有反對。又，慶長十五年（1610）十二月，本多正純（1565~1637）送呈明朝押有家康印的文書中，有「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賓」等語。[185]其中琉球稱臣，安南等東南亞國家輸臣是事實。但非朝貢國的朝鮮，卻將其做為朝貢國，此應亦是家康未將朝鮮視為對

182 雨森芳洲，〈交鄰提醒〉，收入氏著，《芳洲外交關係資料、書翰集》，82。

183 松田甲，〈會津松平家と朝鮮〉，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 5 編，41、44~56。會津藩的祖先正之公，是德川秀忠的第三男，封於奧洲會津，賜松平氏，死後奉祀於土津社。高津溜川當時仍是江戶昌平黌在學中，後為日新館的儒官。參見松田甲，〈會津松平家と朝鮮〉，31、47。1605～1811 年，朝鮮通信使與日本各界的筆談唱和集，參見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7），648~665。

184 中村孝也，《德川家康文書の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80~1982），中卷，330~333。

185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卷 12，〈外國書上〉，遣大明國，130 上下。

等國的一種意識反映。[186]其後較受矚目的有熊澤蕃山（1619~1691）、山鹿素行（1622~1685）、新井白石、安藤昌益（1703~1763）、中井竹山（1730~1804）、本居宣長（1730~1801）等。

熊澤蕃山在《集義和書》中有：

> 九夷之內，朝鮮、琉球、日本最優越。三國之中，又以日本最優秀。然中夏之外，四海之內，無及日本之國，此乃天照皇神武帝之御德。[187]

他認為四海之內，沒有比日本優秀的國家。其視朝鮮不如日本的意識，顯而可見。

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1669）〈中國章〉有：

> 況朝鮮蕞爾。……況朝鮮、新羅、百濟，皆本朝藩臣。[188]

在〈附錄或疑〉有：

> 高麗本我屬國，云文云武又不比外朝（中國），況中華（日本），故慢表受愧。……恐懼中朝之文武。[189]

在〈禮儀章〉有：

> 愚謂新羅王子來朝，任那來貢，既在崇神、垂仁帝。其後，……船柁不乾，每歲朝貢不絕。初每國置官家，為海表蕃屏。此後，以歷代子弟為質，常朝貢。否，乃征伐，以懲不庭。然海外諸蕃皆屬中國，唯以外朝通信，諸蕃不足稱鄰。[190]

另外，在《配所殘筆》（1675）中有：

> 況以勇武之道，征服三韓。責高麗，陷其王城，為日本之府，異朝

186 矢沢康佑，〈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朝鮮観について〉，23~24。

187 熊澤蕃山，《集義和書》，收入橫川四郎編，《熊澤蕃山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9 再版），卷 8，〈義論之一〉，291。

188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3 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中國章〉，22。

189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附錄或疑〉，216。

190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禮儀章〉，149。

信受之。武威震四海事，自上古以迄近代。[191]

在《謫居童問》有：

其國二度亡，四度易姓也，其俗甚陋隘，尤信釋氏，王之子弟必為僧。信鬼神巫史，不知聖經。……或從契丹，或屬大明。其國雖分八道，其兵不出三十萬也。……四海雖廣，水土不比本朝（日本）。雖曰大唐，不如本朝之全也。……高麗為天神賜住吉天皇之國，征此國易也。[192]

山鹿素行認為朝鮮是蕞爾小國，是天照大神賜予住吉天皇之國。自古即為日本所征服，向日本朝貢，為日本的屬國。其俗鄙陋，不知聖經。或從屬契丹，或從屬明朝。文武皆不如日本，懼怕日本，征討此國並不難，不必與其修好交鄰。他在《山鹿隨筆》中又有：

征伐朝鮮之心，……況征，正也，以我之正，正人之不正，謂征。秀吉有何正，正高麗之不正也。[193]

即肯定秀吉侵略朝鮮的正當性。山鹿素行是一位徹底蔑視朝鮮的學者，這種朝鮮觀基本上來自《日本書紀》。同時也是他做為兵學家，提倡古學，最現實的反映。後來有更多人抱持和他相同的看法。

新井白石的改革，如前述，可以看到他有意將日本與朝鮮置於對等關係。但這種對等關係是日本天皇與清朝天子對等，德川將軍做為日本國王與朝鮮國王對等，結果日本是居於朝鮮之上。[194]他在〈殊號事略〉曰：

古時，三韓為本朝西藩，其國之君皆臣屬本朝，（本朝）王其國。今朝鮮之君，併彼三韓之地，王其國。然以其偽官（大君），加稱我國之君，可謂冠履易其所也。[195]

---

191 山鹿素行，《配所殘筆》，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2 卷，592~593。

192 山鹿素行，《謫居童問》，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2 卷，332、333、334、336。

193 山鹿素行，《山鹿隨筆》，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1 卷，295、296。

194 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58），92。

195 新井白石，〈殊號事略下〉，收入今泉定介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3 冊，635。

在〈國書復號紀事〉曰：

> 夫朝鮮狡黠多詐，利之所在，不顧信義，蓋蕞貉之俗，天性固然。[196]

在〈朝鮮聘使後議〉曰：

> 文祿之初，日本朝鮮戰起，其禍相連七年，太閤秀吉薨逝後，我軍得還。……東照宮御代，改前代之非，……兩國和事，……及百年，……我再造之恩，彼國君臣所不可長忘也。……然彼信使恥其國武事難敵，改以長我國之文事爭之。……朝鮮之事，非永結隣好之國。[197]

新井白石亦認為朝鮮在古代是日本的屬國，對其民族性的批判是，狡詐重利、不顧信義。德川家康時，兩國議和，這是日本對朝鮮的再造之恩，朝鮮君臣不應忘記。結論則為朝鮮是不能永結鄰好的國家。白石是朱子學者，尊敬朝鮮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有此蔑視朝鮮的言論。

安藤昌益排斥戰爭，認為日本侵犯朝鮮是錯誤的。[198]但他在《統道真傳》中言：

> 朝鮮國，……其心術愚魯，易迷釋氏之誑巧，易泥聖人之謀教。故妄信聖、釋二教。……信儒教之盜道，恐漢土之偽威；貴妄巧之佛法，不知己國衰微。恐日本妄偽之威，伏日本、永諂日本如下人，不知辱恥。恐三國如囊中鼠子，其心術欲深、拙神、義薄之故。信佛法欲深，欲極樂之故。信聖教，拙神之故。降日本，義薄之故。學問泥佛巧，貴儒教，皆自己具足，夢現不知自然真，隨妄之弱國也。[199]

他批判朝鮮妄信儒教、佛教，更批判朝鮮的民族性。認為朝鮮恐懼日本，

196 新井白石，〈國書復號紀事〉，收入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4 冊，702。

197 新井白石，〈朝鮮聘使後議〉，收入市島謙吉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4 冊，679~680、683。

198 渡邊大濤，《安藤昌益と自然真營道》（東京：勁草書房，1970 二刷），〈非戰論と禁酒論〉，13；〈法世に於ける真人の生活法〉，300。

199 安藤昌益，《統道真傳》，收入野口武彥編，《日本の名著》第 19 冊，《安藤昌益》（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 四版），下，〈万国巻〉，「朝鮮国」，354。

屈服於日本，諂媚日本如下人，而且不知恥。又，其恐懼中國、天竺、日本三國，如囊中之鼠，其國乃弱國也。顯露對朝鮮的蔑視。

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1789）中言：

> 神功遠征已來，韓國服從朝貢，為我屬國歷代久不絕。今勢是異，……元來蕞爾偏邦使价，假令今非屬國，斯迄傾天下財粟應接不及，今日廟堂能知此弊，姑停韓聘之期。……上古修八拾船歲貢，守鞭梳之誓，……。[200]

竹山雖言朝鮮今已非日本屬國，但仍不忘朝鮮過去以八十船歲貢。他主張今日對此偏邦小國使節的接待，不宜過於浪費。本居宣長是國學者，他批判中華至上主義，主張日本是萬國之宗。[201]對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認為是偉業，稱讚秀吉將皇國之光照耀高麗、唐土。[202]

這些蔑視朝鮮的學者，多半從朝鮮自古為日本屬國，向日本朝貢，及朝鮮民族性狡詐、重利、不知恥等偏狹視野做批判，政治意識濃厚。

（三）征討朝鮮

十八世紀是幕藩體制逐漸解體的時期，另一方面則有來自北方的威脅，即所謂海防問題。部分學者開始提出侵略朝鮮的理論，如林子平（1738~1793）著有《三國通覽圖說》（1785）和《海國兵談》（1786），討論北方問題和海防問題。他在《海國兵談》自序中言：

> 予曩著三國通覽，……明日本三鄰國朝鮮、琉球、蝦夷地圖之意。日本之雄士任兵，有事入此三國時，諳此圖應變也。此海國兵談，亦是當彼三國，及唐山、莫斯歌未亞等諸外國海寇來時，可詳悉防禦之術。[203]

即他撰寫《三國通覽圖說》的目的是，當日本軍隊有事進入朝鮮、琉球、

200 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卷 2，〈朝鮮之事〉，53 下~54 下、58 上。

201 岡田千昭，〈宣長學の性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その日本至上主義思想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史學》57 號（1975，福岡），34~43。

202 本居宣長，《馭戎慨言》，下之卷下，117。日本將朝鮮亦稱為唐。

203 林子平，《海國兵談》，收入《林子平全集》第 1 卷（東京：生活社，1943），388。

蝦夷等三國時，可依此書做應變。撰寫《海國兵談》的目的，則是三國以及中國、帝俄等外國入侵時，可以瞭解防禦之術。矢沢康佑認為，不能說林子平沒有預想朝鮮侵略日本的可能，但他對此問題認真思考到何種程度，則是疑問。毋寧可說這是他從現實上思考日本對三國的侵略。[204]《海國兵談》中又有：

> 神武帝始成一統之業，自立給人統，神功皇后使三韓臣服，太閤討伐朝鮮，迄今世服從本邦，皆武德所光耀也。[205]

即將朝鮮看做當時也臣服日本，這都是神功皇后征服三韓、豐臣秀吉討伐朝鮮等武威光耀的結果。林子平並沒有直言用兵朝鮮，但他的著述已明確說明了日本可以侵略朝鮮，及應做的準備。

本多利明（1744~1821）在《西域物語》（1798）中有：

> 今中國國號大清，……西南至東京、交趾、占城，東至朝鮮，皆分領。唯日本不為屬國，海路距離不過二百五六十里，雖曰小國，因神武垂訓，武道不失，故至今無自他國侵掠之事，誠好風俗也。[206]

此外，他對秀吉侵略朝鮮，在〈經世秘策〉中則言：

> 秀吉經昇關白，其後讓關白職予秀次，自稱太閤，古今獨步之大量，日本均平。……已攻朝鮮，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六十三歲薨去。……若長壽，有支那應為日本屬國之勢。[207]

本多利明強調朝鮮是大清的屬國，而日本則不是。他認為豐臣秀吉若長壽，則中國也有可能成為日本的屬國，對秀吉侵略朝鮮予以肯定。他對朝鮮的看法，並沒有明言。但從他對秀吉的讚嘆，可以推測他不無主張經略朝鮮之意。

明確提出侵略朝鮮觀點的為佐藤信淵（1769~1850），他在《混同秘

---

204 矢沢康佑，〈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朝鮮観について〉，28。

205 林子平，《海國兵談》，16 卷，349。

206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收入佐藤昌介編，《日本の名著》25（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 再版），431。

207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收入塚谷晃弘、藏並省自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4（東京：岩波書店，1970），《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卷下，25、36。

策》（1822）中言：

> 皇國開他邦，必先吞併支那國。……凡經略他邦之法，從弱而易取處始為道。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易攻取之土地，自支那國滿洲。……夫不啻得滿洲，支那全國之衰微亦自此始。既取得韃靼，朝鮮、支那亦次第可圖也。[208]

說明日本經略他國之法，要從弱而易取處開始，即先取滿洲，而後韃靼（蒙古）、朝鮮、中國。日本若想經略他國，必先併吞中國，併吞朝鮮則是併吞中國的進程之一。至於如何出兵朝鮮，《混同秘策》又言：

> 而其出軍次第，先第一青森府，第二仙臺府，……第五松江府，第六荻府，此二府數多之軍船積載火器、車筒至朝鮮東海，經略咸鏡、江原、慶尚三道諸州。第七博多府之兵，出數多之軍船至朝鮮國南海，襲忠清道諸州。朝鮮既為我松江、荻府之強兵所攻，東方一圓寇困之外，南方諸州或成空虛。直進之攻之，盡大銃、火箭之妙法，諸城必皆望風奔潰。及取其數城為皇國郡縣，……。[209]

即日本松江、荻二府的軍隊進攻朝鮮咸鏡、江原、慶尚三道各州，博多的軍隊襲擊朝鮮忠清道各州。當朝鮮諸城望風崩潰後，再以其數城做為皇國的郡縣。佐藤信淵進一步提供了日本侵略朝鮮的藍圖。此侵略朝鮮的主張，至十九世紀，勝海舟（1823~1899）、平野國臣（1828~1864）、吉田松陰（1830~1859）、橋本左內（1834~1859）等人，有更詳細的論述。[210]

江戶時代學者的朝鮮觀，如上所述，呈現正、反兩面強烈的對比。朝鮮高度的漢學水準，使日本知識分子嚮往、熱切追求。但古代日本征服朝鮮的傳統意識，則又使他們產生朝鮮是日本的屬國，朝鮮應向日本

208 佐藤信淵，〈混同大論〉，《混同秘策》（東京：改造社，1943 十五版），61、64、65。

209 佐藤信淵，〈混同大論〉，《混同秘策》，67~69。

210 海舟全集刊行會編，《海舟全集》9 卷（東京：改造社，1929）；平野國臣顯彰會編，《平野國臣傳記及遺稿》（福岡：博文社，1916）；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1 卷（東京：大和書房，1972）；滋賀真編，《橋本景岳全集》上卷（東京：景岳會，1939）。此部分將另文討論。

朝貢的優越感。十八世紀後半開始，日本因海防問題，以及向外擴展的野心，征服朝鮮成為一些學者主張防衛日本的理論根據。

六、江戶時代民眾的朝鮮觀

本節所謂民眾，包括一般文人、僧侶、醫者、庶民等。由通信使一行沿途受到他們歡迎的程度，基本上可以說這些民眾的朝鮮觀是正面的。通信使團的成員在回國後留下不少日本紀行，其中也述及他們住宿各地客館時，日本民眾求詩畫、唱和漢詩，絡繹不絕的景況。雖然不無鄙視之意，但相對的也反映了日本民眾對朝鮮學者、文化的景仰。由於缺乏直接史料，下文僅以 1682 年、1711 年、1719 年、1748 年、1764 年五次通信使的日本紀行做說明。

文人與使節團成員的筆談、唱和頗多，內容亦相當廣泛。但文詞拙樸、態度卑屈，常被使節成員視為「可笑」。文人群至客館乞書畫，使節之應對，如金指南（1682 年漢學前正）於《東槎日錄》言：

> 我國文獻之名，素飽日東人之耳目，求詩求墨之請，在路次已不可堪。及到舍館，自館伴與其國執政者，以至廝養之倭及儒釋好事輩，張紙硯墨，日來求懇。而余於詩尤昧昧焉，愧心之發無以為辭，必委於洪道長、成伯圭若夫筆札。則余雖無臨池之學，好紙精縑，堆積眼前，而來者雜遝，揮之不去，始試忘恥揮灑，終遂成一苦役。矢在絃上，不得不發云者，豈謂此耶。[211]

即沿途對日人求詩求墨，已不堪應付。到客館後，館伴、執政者，以至小役、好儒佛者，全上門求請。金指南自言不懂詩，但面對「好紙精縑，堆積眼前，而來者雜遝，揮之不去」，因此也試著忘掉羞恥開始揮灑，但畢竟這是苦差事，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又，任守幹（1711 年副使）於《東槎日記》言：

---

211 金指南，《東槎日錄》，收入《海行摠載》第 6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49 上。

國俗最喜我國人文字及書畫，如得隻字片言，寶藏而傳玩之。甚至求書於下卒輩稍解把筆者，亦不莫酬應云云可笑。[212]

即日人若得朝鮮人的隻字片語，則寶藏而傳玩。甚至求字於僅略懂文墨的下卒，實為可笑之事。

申維翰（1719 年製述官）於《海游錄》中，記載更多，如在藍島：

遠近求詩者沓至，紙幅堆案乞書，書了復集如積薪，雖庭間僕隸，無不人人希覬得一字，輒攢手至頂，若得秦皇狐白裘者，即其工拙無論已。[213]

在兵庫：

群倭聚集如雲，時時有夾紙筆而乞書者，余或隨興而寫。[214]

在大阪：

與書生十數人，竟夕至夜。令童子磨墨以待，日不暇給。其人至則各書姓名、字號，雜然而進者，多駭眼，其詩又蹇拙不可讀。[215]

在江戶：

連日在館，尋常詞客之來見者相繼，詩唱和及筆談酬酌，苦無閑隙。又有自外請乞者，因雨森東、兩長老而達之，曰集序，曰題畫，曰贊像，曰詠物之類，皆願手書，押圖章而去，令人汩惱無暇。[216]

外人求詩及札翰相繼，余以憊困成疾，頗欲謝絕，而不得已多所強應。[217]

在名護屋：

自遠方來者，魚貫而集，坐見堂皇閣道庭場間。窄而降者，引而

212 任守幹，《東槎日記》，收入《海行摠載》第 9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93 上。

213 申維翰，《海游錄》上，57 上。

214 申維翰，《海游錄》上，「九月三日」條，62 上。

215 申維翰，《海游錄》上，63 下。

216 申維翰，《海游錄》中，72 上。

217 申維翰，《海游錄》中，「十月十三日」條，73 下。

> 升者，環立而睨者，無不人人乞詩求語。或以余前日所題詩作彩幛，請押圖章而去。或以其所著集稿，托人而侑之。……即紙疊如雲，毫攢如林，須臾而匱，復進之。余亦有時氣渴，頻頻破柑以佐觴。為古詩近體，依韻次韻，無一起草。寫輒被他袖去，不自知幾許篇。[218]

回到對馬島時：

> 倭人之乞詩文者，愈久未矣。或自數千里外，轉托於馬島諸人。雨森東亦疲於紹介，每有請簡，不得已泛應，所以日俯首硯墨之場，吞酸吞辛，莫非磨驢故跡可笑。[219]

另外，申維翰在〈附聞見雜錄〉中，又有：

> 日本人求得我國詩文者，勿論貴賤賢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貨之如珠玉。即舁人廝卒目不知書者，得朝鮮楷草數字，皆以手攢頂而謝。所謂文士，或不遠千里而來待於站館。一宿之間，或費紙數百幅，求詩而不得，則雖半行筆談，珍感無已。蓋其人生長於精華之地，素知文字之可貴，而與中華絕遠，生不見衣冠盛儀，居常仰慕朝鮮。故其大官貴游，則得我人筆語，為夸耀之資；書生則為聲名之路，下賤則為觀瞻之地。書贈之後，必押圖章，以為真蹟。每過名州巨府，應接不暇。[220]

由申維翰用「遠近求詩者沓至」、「群倭聚集如雲」、「尋常詞客之來見者相繼」、「自遠方來者，魚貫而集」、「或自數千里外，轉托於馬島諸人」等語，知日人至客館者相當多，有些還是自數千里外，遠道而來，人人希得一字。對這些到客館來的日人，申維翰則日夜不停，以應所求。有時口渴，還得頻頻剝柑配酒。有時疲困生病想謝絕，但不得已仍勉強應付。成疊紙張瞬間用完又立即送上，一夜之間費紙數百幅。[221]無論古

---

218 申維翰，《海游錄》上，「十月二十五日」條，74 上。

219 申維翰，《海游錄》下，收入《海行摠載》第 2 輯，「十二月二十六日」條，2 下。

220 申維翰，《海游錄》下，收入《海行摠載》第 2 輯，〈附聞見雜錄〉，9 下。

221 朴安期（1643 年隨行進士）言：「識字之人必求詩文，雖不識字者亦求拙筆。……是以一日之間，作詩文幾至數十篇，揮拙筆幾至七、八十幅，至夜分不得寢。」京都史蹟會

詩或近體，全不起草，寫完立即被拿走。每天俯首硯墨，辛苦至極。至於日人求得詩文後，無論貴賤賢愚，都將它當做至寶。即使是廝役隸卒，若能得到幾個朝鮮楷草字，莫不以手攢頂而謝。文士求詩不得，若能筆談半行，亦感謝不已。其因乃是大官貴人若能得到朝鮮人的筆語，則可誇耀他人；書生則可以得到聲名；下賤之人可以做為觀賞。所以贈予日人的書畫，必被要求蓋上圖章，表示是親手之筆。申維翰是製述官，與日人筆談、唱和詩文是他的職務。[222]因他與日人接觸多，感受亦深刻，在這方面的紀錄也特別詳細。

此外，曹命采（1748 年從事官）於《奉使日本時聞見錄》中，言：

> 製述書等來言：求詩者日日沓至，酬應難支。而渠輩執贄之詩，奇奇怪怪，不得不以應。卒為事前置印朱圖章，使得詩者印去，紛紜爭先，搜着甚多。蓋使行過去之後，則江戶之人搜聚沿路唱酬之詩，皆即刊行，而此輩以得參其中為極榮。無圖章之詩，則拔而不錄，故如此云。[223]

即日人求詩必要求蓋章，因朝鮮使節回去後，江戶人必搜集、刊行使節沿路贈與日人的詩。如果沒有使節的圖章，就不收錄。得到贈詩的日人，則以能參與此事，而備感榮耀。

趙曮（1764 年正使）於《海槎日記》亦言：

> ……而彼人如得我國人筆蹟，則毋論諧（楷）草優劣，舉皆喜踴，求之者絡繹不絕。不但於寫字官，行中之稍解書字者，亦不堪其苦請。至於乘船，隨後又手拜乞。書之者未暇揮灑，居間紹介之馬島通詞輩，亦多操縱而索賄云，其意誠莫曉也。或以謂如得朝鮮筆蹟而藏置，則多有福利云，此是無理之談。其或以朝鮮禮義之邦尊貴之，愛其人不足，至愛其筆蹟而然耶，亦未可知也。[224]

編，《林羅山文集》，卷 60，雜著 5，〈與朝鮮朴安期筆語〉，716 上。

222 申維翰，《海游錄》上，48 下。

223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收入《海行摠載》續第 10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七月二日」條，48 上下。

224 趙曮，《海槎日記》，「一七六五年正月十一日」條，21 上。

即日人若獲得朝鮮人筆墨，無論楷草是否優劣，莫不歡喜。不僅寫字官，使節團中有稍能書寫者，亦不堪其請。趙曮的論述，大體與申維翰相同。至於對馬島通詞（翻譯）居間介紹、操縱、索賄，此大約是他們必須護隨通信使，可以隨時與使節成員接觸，以致有此弊端。[225]

日本文人與朝鮮使節筆談的內容，金指南於《東槎日錄》載：

> 有一儒倭，列書其國婚喪祭賓等禮，而來示於余曰：貴國常行之禮，亦倣乎此否，願聞其略云。余觀其所記，無不是醜陋而怪訝者也。[226]

任守幹《東槎日記》載：

> 夜間雨森東率筑前人竹田定直、神屋亨等而來，與製述諸人賦詩酬唱，詩則亦不成說，其文一篇，論儒家學問及明末諸家之說。敘致頗有可觀，誠可異也。[227]

申維翰在《海游錄》言：

> 群倭又請見我國諺文字形，略書以示。又問創於何代，余答曰：是惟我世宗大王，聖文神化，博通百藝，作為十五行新模，以該萬物之音，距今三百年矣。[228]

又言：

> 諸生輩筆談問目，必以退溪集中語為第一義。有問陶山書院地屬何郡；又曰：先生後孫，今有幾人，作何官；又問先生生時所嗜好，其言甚多，不可盡記。大坂文士一人，列書我國從祀諸賢，自崔文昌、薛弘儒，以至沙溪文元公，其序次一不參差。其外，禹祭酒之忠貞，李牧隱之文章，及佔畢齋先生事，歷歷稱道。彼其所聞於我國之事，何其詳也。[229]

日本文士與使團成員筆談之內容，如上所引，有婚喪祭賓等習俗，及儒

---

225 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十三日」條，45 上；申維翰，《海游錄》上，64 上；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四月六日」條，17 下。

226 金指南，《東槎日錄》，「九月二十九日」條，51 上。

227 任守幹，《東槎日記》，56 下。

228 申維翰，《海游錄》中，「十月二十五日」條，74 上。

家學問、明末各家之說、朝鮮文字的創始等。其中以談論李退溪最多，包括陶山書院、[230]退溪的後代、嗜好等。有些文士對朝鮮諸賢，如崔文昌、薛弘儒（以上兩人新羅儒者）、文元公（1548~1631）的從祀次序，可以毫無錯誤的列出。對禹倬（1263~1342）的忠貞、李牧隱（1352~ 1409）的文章、佔畢齋的事蹟，甚為詳悉。

通信使通常停宿各地佛寺，如對馬西山寺、赤間關阿彌陀寺、鞆福禪寺、大阪本願寺、京都本國寺、江戶本誓寺等，[231]而且由五山長老護行至江戶。故僧侶送詩、求贈和，不乏其例。如金指南於《東槎日錄》載，在對馬島時：

> 兩僧（森、靈）自後出詩箋，送三使乞和。三使走毫次贈，又用其韻各賦二絕贈之。使之和之，辭以日暮追和。有頃，使相起出，島主與兩僧追至廳端，揖而送之。[232]

在赤間關阿彌陀寺時：

> 主僧出示乙未（1655）使行所賦詩句於三使前，而懇請續琚。三使各賦一章以贈之。[233]
>
> 有一少年可愛僧人，頗解文字，以書問之，則以業醫居在太守門下，而為支待出來云。相接之後，求書甚懇。以拙筆書給數丈，如得重寶，稱謝僕僕而去，甚可笑也。[234]

由這些敘述，可知僧侶對通信使的贈文，如獲至寶，而且態度恭敬。正

---

229 申維翰，《海游錄》中，75 下~76 上。

230 陶山書院為李退溪弟子及儒林為追慕退溪之高德，於 1560 年所建，在慶尚北道安東市。

231 申維翰，《海游錄》上，「九月四日」條，63 上；中，「九月二十七日」條，69 下；下，「十二月二十日」條，2 上。松田甲，〈鞆の福禪寺と朝鮮信使〉，《朝鮮》140 號（1927，京城府），101~116；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江戶時代の三都》（東京：明石書店，1993），80~81，表 1 及 21~40。

232 金指南，《東槎日錄》，「6 月 29 日」條，44 上。

233 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十二日」條，45 上。

234 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十四日」條，45 上。製述官成琬與僧侶亦有唱和，參見洪禹載，《東槎錄》，收入《海行摠載》第 6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一六八二年七月十四日」條，27 下。

使、副使、從事官三使節，願贈予詩賦，當與森、靈二僧擔任護行之任，及另一位是該寺主僧之故。至於給予少年僧人之求字，則是由於其態度懇切。對僧侶的乞詩，使節多半答以「歸路予之」。趙曮於《海槎日記》載：

> 住持僧主忍者出謁，進前後我國人詩章謄本，仍乞一詩，以歸路書給答之。而渠之製呈者，無可觀矣。……自前論此寺者，或比之於我國襄陽洛山寺，觀於南壺谷日記，則可知矣。寺僧因是語乞得洛山寺之畫本於畫師，故亦許歸路。[235]

（吉原清見寺）住持僧主忍者乞詩，且向畫師乞朝鮮洛山寺畫本，使節均許以回程給予。所以如此，乃此為往江戶之途，「使事未竣」之故。[236]又如葛長老跟隨信使從大坂至江戶，又從江戶回大坂，申維翰在《海游錄》中言：「山河道里，往返數千里，所與酬贈之篇不為不多。」[237]此外，也有僧侶在信使往返途中，二度至客館筆談、贈詩者。《海游錄》又載：

> 余在佐和城（近江之都會）遇龍潭寺僧素盈者，筆談竟夜。歸路又與相見，其僧頗款款，以詩贈行。……語雖枯拙，情景可愛。[238]

僧侶與通信使節談詩、求畫，與文人無異。

醫者與使節間的賦詩、筆談，據《海游錄》載，有筑前（福岡）醫官少野玄林、大垣（在今岐阜縣）漢醫北尾春圃父子六人、大醫林良意父子等。[239]又，趙曮於《海槎日記》載：

> 良醫李佐國來言，平戶醫倭來贈白石一片，而非石非土，體輕而中有葉文，此必寶物。果能知之云，而莫知所對，將何以處之云。余乃考出金東溟日記，則有來示此石者，答之以開闢前物云矣。乃使

235 趙曮，《海槎日記》，「二月十一日」條，27下。

236 趙曮，《海槎日記》，「十一月三日」條，10上。

237 申維翰，《海游錄》中，76上。

238 申維翰，《海游錄》下，11下。

239 申維翰，《海游錄》上，57上；申維翰，《海游錄》中，「九月十五日」條，67上；「十月八日」條，72下。

> 李醫以此答之曰：君以怙物為寶，我以不貪為寶；還君之寶，守吾之寶，可謂兩全寶矣。[240]

即朝鮮良醫對日本平戶醫者所送之白石，認為是寶物，不知如何處置。趙曮則要他告訴日本醫者：君以此石為寶，朝鮮以不貪為寶，此石還君，則雙方可以各保其寶。

其他較著名者，如 1711 年北尾春圃（1659~1741）和良醫奇斗文的筆談，後出版有《桑韓醫談》（1713）。1719 年在大阪客館，築山龍山和醫員白興銓的問答，則收錄於《桑韓唱和集》。1748 年，京都儒醫直海龍與良醫趙崇壽筆談本草，浪華（大阪）醫士百田安宅與趙崇壽問答醫事，後分別收錄於《韓人唱和產物筆語班荊閒譚》、《桑韓鏗鏘錄》。1764 年，山田圖南和李佐國的問答，有《桑韓筆語》。[241]這些都是日韓兩國在醫學上的交流。

與朝鮮通信使會面、筆談的日本人，也有年紀輕而有文才者。申維翰於《海游錄》言：

> 國中文才，多在童稚，大坂之水足童子年十四，北山童子年十五，倭京之明石景鳳年十八，江都之河口皐年十七，無論所讀述已富。皆貌如玉雪，視瞻端正，言動安詳，似禮法中人。[242]

這些十四到十八歲的青少年，在申維翰眼中，都頗具文才。其中水足童子，申維翰有更詳細的敘述。

> 一童子年十四，面目如畫，操紙筆而前，手談及韵語，咄嗟而成。自言水足氏，安方名，家在北陸道千里外，與其父屏山者偕來，蓋欲鳴藝於使館。余為撫頂，而呼曰：神童神童，其父大驩。請命字號，余謂水足氏，應溥博淵泉之義，號曰：博淵。安方者，有足踏大方之象，字曰：斯立可矣。別草記以給，其父子俱稽顙謝。至是

240 趙曮，《海槎日記》，「十一月十九日」條，12 下~13 上。

241 李進熙，《日本文化と朝鮮》，155；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7），654、658。

242 申維翰，《海游錄》下，〈附聞見雜錄〉，12 下~13 上。

童子端妙者來見甚眾，南溟亦率其從弟年十五者前拜。[243]

水足童子即水足安方，他與父親水足屏山遠從北陸（應是熊本）至大阪求見申維翰，期望在使館中大顯文才。申維翰則撫其頭，稱讚他是神童。屏山請求申維翰為其父子命字號，申維翰給予屏山之號為博淵，給安方之字為斯立。[244]申維翰同時又言，這之後端妙童子來見者更多，[245]南溟若水亦領十五歲從弟來見。至於十八歲的明石景鳳，申維翰稱讚他「筆勢如琳琅」。[246]

此外，申維翰在《海游錄》中還提到，他在江戶時，有兄弟名長澤學和長澤主者，兩人皆目盲能詩，「命韻試之，應口而對」，申維翰亦「和韻而贈之」。[247]另有年僅十一歲、自稱粟屋氏的小女孩，到客館來寫書法，雖不成樣，但申維翰認為以這樣的年紀能作到如此也是異事，所以仍為她題小序。[248]又，曹命采在《奉使日本時聞見錄》中亦言，不少日本老者，捧筆硯列立道旁，向使者叩頭求字。[249]其他如飲食、態度、生活日用方面，也可以看到當時日本人對朝鮮人的好感。

趙曮《海槎日記》載：

倭人於我國飲食，如得使行所賜或退饌，則愛惜不忍食。至於細炙有汁者，亦皆紙裹不嫌其流汁，藏懷而去。或以尊者之賜而然耶，其以他國之膳希貴而然耶。[250]

即日本人對朝鮮使節所賜或撤下的食物，皆愛惜不忍食。縱使是有汁的食物，亦用紙包裹藏懷中，不怕湯汁流出來。所以如此，是因為此為尊

243 申維翰，《海游錄》上，63下。

244 松田甲，〈水足博泉と申維翰〉，收入氏著，《日鮮史話》第5編，88~94。

245 另可參見金指南，《東槎日錄》，「七月二十二日」條，46上；趙曮，《海槎日記》，「一七六五年二月十九日」條，30上下；申維翰，《海游錄》上，57下。

246 申維翰，《海游錄》中，「十一月一日」條，74下。

247 申維翰，《海游錄》下，13上。

248 申維翰，《海游錄》下，「十一月二十七日」條，1下。此小女孩即佐佐木曲江，參見朴春日，《朝鮮通信使史話》（東京：雄山閣，1992），72。

249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六月十七日」條，44下。

250 趙曮，《海槎日記》，「十一月二十九日」條，14上。

貴者所賜，因為它是外國食物特別珍貴之故。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亦載：

> 左右觀光者，雖少損於前，而隨從船之下輩，以菓子及饅頭投與左右岸，老少男女爭相拾取，或倒或跌，得之者甚貴之云。[251]

在河岸觀看的日本老少男女，爭相拾取信使團下卒從船上投下的菓子和饅頭。拾得者，則珍貴之。同書又載：

> 市上有以色紙作旗，書以「清道」倣我國旗制，而又畫行中威儀之狀，倭兒爭先買之。[252]
>
> 見路上之老倭老媼，多向使行合掌而祝曰：沙乙邑我，沙乙邑我。我問之從倭，則即好歸去之祝云。……而觀光者見我人，則時以柑子贈之。村人則以真瓜等物贈之，沿路皆然云。[253]

即小孩爭先購買畫有類似信使行列的色旗。路邊觀看的人，以橘子、真瓜（真桑瓜）贈與使節。[254]老少日人，合掌祝福使節歸途平安。其他如在屏風（洛中洛外屏風圖）、畫卷、浮世繪、版畫、刊物等，描繪盛大華麗的通信使行列圖，[255]此皆反映日本民眾對朝鮮文化的接納與對朝鮮人的友善。

民眾的朝鮮觀，由崔天宗事件也可另做觀察。1764 年 3 月 11 日，通信使在慶賀家治（1737~1786）襲將軍職後，離開江戶。4 月 5 日行至大阪，7 日都訓導崔天宗被殺。根據趙曮的記載，事件起因於崔天宗懷疑遺失的鏡子被護行的對馬通詞鈴木傳藏所竊，因此以馬鞭鞭打傳藏，傳藏不甘受辱，殺死崔天宗。事件發生後，傳藏逃走，但 4 月 18 日被逮捕，5 月 2 日梟首示眾。[256]其後，以此事件為題材改編的文藝作品相當

---

251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六月二十八日」條，47 下。

252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六月十三日」條，43 上。

253 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六月十四日」條，43 下；「六月二十四日」條，46 上。沙乙邑我，日文為「さらば」，再見之意。

254 美濃國本巢郡真桑村（今岐阜縣真正町）出產之瓜。

255 田中健夫，《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130~131。

256 趙曮，《海槎日記》，37 下~43 上。

多，如歌舞伎《世話料理鱸包丁》（明和四年，1767）、《今織蝦夷錦》（同上）、《漢人韓文手管始》（寬政元年，1789）、《けいせい花大湊》（寬政八年，1796）；淨瑠璃《世話仕立唐縫針》（寬政四年，1792）、《唐土織日本手利》（寬政十一年，1799）；狂言《拳褌廊大通》（享和二年，1802）等。[257]其中《漢人韓文手管始》，直至 1864 年仍不斷上演。此改編劇是以室町時代的長崎和博多為舞台，鈴木傳藏成為今木傳七，崔天宗成為宗九郎，劇情與《世話料理鱸包丁》有很多共通點。[258]再如寫實小說《唐人殺》（又名《難波夢》，1765），內容大致如下：1734 年在長崎丸山的遊女屋，日本遊女千歲與朝鮮商人桂彥戀愛懷孕，桂彥與千歲約定明年再到長崎來相會。但桂彥回朝鮮後，被妻子和甥萬麗設計害死，萬麗則改名崔天宗。千歲生子，名千太郎，因做夢知桂彥已被其甥殺害。不久千歲被對馬藩通詞鈴木傳右衛門贖身，死前她告訴千太郎父親的仇人是誰。千太郎後來繼承鈴木家，改名鈴木傳藏。1764 年，朝鮮通信使至日本時，崔天宗以上上官的身分到日本，鈴木傳藏則以對馬藩通詞隨行。不久，傳藏知崔天宗是殺父仇人，因此在崔天宗懺悔之後，殺死崔天宗，報了父仇。[259]池內敏認為，作者安排崔天宗懺悔，此真實地表達了當時日本民眾的朝鮮觀。即崔天宗的父母都是朝鮮人，而鈴木傳藏的父親雖是朝鮮人，但母親是日本人，所以傳藏可以復仇。[260]由上述二種根據崔天宗事件創作的戲劇和小說，大致亦可以推測，當時的日本民眾在與朝鮮人做比較時，似仍存有優越感。

257 辛基秀，〈歌舞伎「唐人殺し」と朝鮮通信使〉，收入氏著，《朝鮮通信使——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161~163；角田豊正，〈朝鮮通信使と歌舞伎〉，收入映像文化協會編，《江戶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每日新聞社，1979），127~ 133。

258 並木五瓶，〈漢人韓文手管始〉，收入山本二郎等監修，《名作歌舞伎全集》，第 8 卷，《並木五瓶集》（東京：東京創元新社，1987 五版），16~98；池內敏，〈近世後期における對外觀と「国民」〉，《日本史研究》344 號（1991，京都），98~99，表 1；辛基秀，〈歌舞伎「唐人殺し」と朝鮮通信使〉，161~163。

259 池內敏，〈近世後期における對外觀と「国民」〉，116 下~117 上。

260 池內敏，〈近世後期における對外觀と「国民」〉，117 下。

七、結論

日本人視朝鮮為藩屬國，始自《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征服三韓的記載。蔑視朝鮮的思想，則根源於中世日本型華夷意識、領域觀念、日本是神國等所形成的民族優越感。神功皇后征三韓後，三韓成為日本的朝貢國，此一觀念沿襲至近世不變。日本型華夷意識則是以日本為「華」，半島國家為「夷」的國際秩序；領域觀念即領域中心皇都是淨，距離皇都越遠，穢亦隨之增加。因此異域的高麗是穢地，穢地的居民則等同境內的賤民；日本是神國的思想，則產生日本至上主義，以致將半島的國家視為牲畜。這些意識、觀念、思想結合在一起，遂使中世日本對半島的國家始終潛藏著蔑視心理。另一方面，由於高麗協助蒙古入侵，因此怨恨高麗，更將半島上的異國人描述成「鬼」和「犬」。此一蔑視朝鮮觀，同樣流傳至近世。

室町時代，將軍給予朝鮮的國書不自稱國王，此正如以心崇傳所言，是因為日本視朝鮮為「蕃夷」。江戶時期，朝鮮通信使被看做是朝貢使節；在江戶城上呈國書時，必須對將軍行蕃國的四拜禮；1711 年，新井白石無視外交禮儀，臨時要求朝鮮修改國書，這些均是未將朝鮮視為對等國的一種意識反映。江戶時期，日本學者的朝鮮觀是多元的，如藤原惺窩和林羅山，兩人的學問都深受李退溪的影響。木下順庵等儒者，則與通信使筆談朝鮮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醫藥、朝鮮著作，或求書畫、唱和漢詩等。但另有一些追求古道的學者，如熊澤蕃山、山鹿素行、安藤昌益、中井竹山、本居宣長等，他們認為朝鮮自古為日本所征服，向日本朝貢。批判朝鮮的民族性，肯定豐臣秀吉侵略朝鮮，蔑視朝鮮。十八世紀中期以後，面對來自北方的威脅，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等更提出侵略朝鮮的理論。佐藤信淵甚至認為，併吞朝鮮是併吞中國的進程之一。征服朝鮮是這些學者主張防衛日本的理論根據。至於民眾，其對朝鮮文化的景仰，與學者無異。在日常的節慶、戲劇、繪畫中，雖仍有朝鮮是朝貢國，是鬼、犬的呈現，但由其對信使的歡迎態度做觀察，蔑視朝鮮的心理似乎並不明顯。

日本對朝鮮的優越感，基本上始於八世紀前後。此種意識持續至十八世紀末，因海防問題演變成主張侵略朝鮮，甚至在十九世紀末付諸行動。其間雖也有如江戶時代上下民眾熱衷朝鮮文化的盛況，但十九世紀以前，朝鮮是日本的朝貢國的觀念，及蔑視朝鮮的心理，則始終支配著日本人的意識。

（責任編輯：李修平　校對：何源湖　陳榮聲）

引用書目

一、中文史籍

〔梁〕沈　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明〕申時行，《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明〕《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縮印本，1984 再版。

二、日韓史籍

〔日〕《堀河天皇》，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 3 編之 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 覆刻。
〔日〕《寬永十三丙子年朝鮮信使記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日〕三善為康輯，《朝野群載》，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29 卷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日〕山鹿素行，《山鹿隨筆》，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
〔日〕山鹿素行，《配所殘筆》，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2 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
〔日〕山鹿素行，《謫居童問》，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2 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
〔日〕山鹿素行，《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 13 卷。東京：岩波書店，1940。
〔日〕不著撰人，《本朝文集》，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30 卷。東京：國史大系刊行會，1938。
〔日〕不著撰人，《諏訪大明神繪詞》，收入《續群書類從》，第 3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32 三版。
〔日〕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收入《改定史籍集覽》，第 21 冊，新加通記類第 15。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 三版。
〔日〕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出版者不明，寬正元年（1789）。
〔日〕中村直勝，《宇多天皇御事紀》。京都：宇多天皇一千年御忌臨時局，1930。
〔日〕中原康富，《康富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京都：臨川書店，1965，37~39。
〔日〕水谷川忠麿編，永島福太郎校訂，《春日社記錄》。奈良：春日大社，1957。
〔日〕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收入佐藤昌介編，《日本の名著》25。東京：中央公論

社，1978 再版。
〔日〕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收入塚谷晃弘、藏並省自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東京：岩波書店，1970。
〔日〕本居宣長，《馭戎慨言》，收入大久保正編，《本居宣長全集》，第 8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 初版三刷。
〔日〕永積安明・島田勇雄校注，《保元物語》，收入高木市之助等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1。東京：岩波書店，1961。
〔日〕生田目經德，《曾我物語》。東京：誠之堂書店，1908 二版。
〔日〕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7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37 再版。
〔日〕安藤昌益，《統道真傳》，收入野口武彥編，《日本の名著》19，《安藤昌益》。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 四版。
〔日〕成島司直編，《德川實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45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33。
〔日〕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
〔日〕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東京：東京堂，1971~1989。
〔日〕西村時彥編，《竹山國字牘》。大阪：松村文海堂，1911。
〔日〕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東京：改造社，1943 十五版。
〔日〕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收入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神道大系》。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1992。
〔日〕貝原好古，《八幡宮本紀》，收入益軒會編纂，《益軒全集》5。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1911。
〔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大阪：弘文社，1930。
〔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詩集》。東京：弘文社，1930。
〔日〕林子平，《海國兵談》，收入《林子平全集》，第 1 卷。東京：生活社，1943 初版。
〔日〕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1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日〕雨森芳洲，《橘牕文集》，收入雨森芳洲，《芳洲文集》。吹田市：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80。
〔日〕雨森芳洲，〈交鄰提醒〉，收入雨森芳洲，《芳洲外交關係資料、書翰集》。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1982。
〔日〕室鳩巢，《兼山秘策》，收入瀧本誠一編，《日本經濟叢書》，卷 2。東京：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1914。
〔日〕後藤丹治、岡見正雄校注，《太平記》，收入高木市之助等監修，《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62。
〔日〕高木市之助等校注，《平家物語》，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2。東京：岩波書

店，1959 一刷。
〔日〕宿蘆俊岳，《宿蘆稿》，收入塙保己一原編、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13 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9。
〔日〕惟宗直本編，《令集解》，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4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日〕萩原龍夫校注，《八幡愚童記》乙，收入櫻井德太郎、萩原龍夫、宮田登編，《日本思想大系》20，《寺社緣起》。東京：岩波書店，1975。
〔日〕管野真道等，《續日本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2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日〕菱川大觀，《正名緒言》。和泉屋善兵衛發行，嘉永二年（1849）版。
〔日〕慈　遍，《旧事本紀玄義》，收入續群書類從完成會編，《續群書類從》，第 1 冊，神祇部。東京：平文社，1970。
〔日〕瑞溪周鳳，《善隣國寶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1 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 三版。
〔日〕熊澤蕃山，《集義和書》，收入橫川四郎編，《熊澤蕃山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9 再版。
〔日〕鎌倉幕府編，《吾妻鏡》，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50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日〕藤原忠平等，《延喜式》，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40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日〕藤原時平等奉勅撰，《日本三代實錄》，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6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日〕藤原經長，《吉續紀》，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料大成》，23 冊。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5。
〔日〕藤原實資，《小右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別卷 1~3。京都：臨川書店，1965。
〔日〕藤原賴長，《台記》，收入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 23 卷。京都：臨川書店，1997 七刷。
〔日〕釋光宗，《溪嵐拾葉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續諸宗部 7，第 76 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1973。
〔韓〕《太宗實錄》、《成宗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特別市：東國文化社，1955。
〔韓〕《增正交鄰志》，收入《奎章閣叢書》6。京城府：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40。
〔韓〕申維翰，《海游錄》，收入《海行摠載》，第 1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任守幹，《東槎日記》，收入《海行摠載》，第 9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

刊行會，1986 再版。
〔韓〕吳允謙，《東槎上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2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李石門，《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3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金指南，《東槎日錄》，收入《海行摠載》，第 6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金誠一，《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1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洪禹載，《東槎錄》，收入《海行摠載》，第 6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曹命采，《奉使日本時聞見錄》，收入《海行摠載》續，第 10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京城府：朝鮮史學會，1928。
〔韓〕趙　曮，《海槎日記》，收入《海行摠載》，第 7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韓〕慶　暹，《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2 輯。首爾特別市：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再版。

Japanese Perspective of Korea in Pre-Nineteenth Century Time

Lo, Lee-hsin*

Abstract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s diplomatic perspectives toward Korea were generally a mixture of contempt, respect, and dominance by military expedition.

Japan's deep-rooted contempt toward Korea originated from its sense of ethnic superiority which maintained that Korea had always been a subsidiary state to Japan since ancient times. Since shogun Ashikaga Yoshimitsu (足利義滿, 1358~1408) was conferred the title of Japanese king by China's Ming Dynasty until the Tokugawa period Japanese shoguns never claimed themselves as "kings" in their state credentials to Korean kings. Regardless of international protocol, Japanese shoguns still failed to treat their counterparts equally.

Japan's respect toward Korea was limited to their cherishing of Korean culture, especially that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when Japanese scholars and general public held high respect toward Korean scholars and took pride in acquiring work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from Korea envoys.

Japan's military expedition to Korea was finally carried out in the modern tim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mainland expansion policy, although the theory had been expressed as early as in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Japanese in general had always held a contemptuous attitude toward Korea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Japanese perspectives toward Korea, ethnic superiority, subsidiary state Ashikaga Yoshimitsu, Tokugawa period, work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